



反抗暴政 深化群眾動員

劍指地產富豪以濟貧民

中國官僚買辦恭迎國際金融豺狼

社會主義革命和拉丁美洲統一

從團結到分裂：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緬懷乃光

反抗暴政 深化群眾動員

本刊評論員



2019年6月以來，香港爆發反修訂《逃犯條例》(簡稱“反送中”)的游行示威，爭取民主公義，反抗政府、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全球觸目。我們全力支持香港市民爭取民主公義的運動，並指出在反對高壓政權統治的同時，亦需要深化群眾動員，連結政治民主與社會經濟民生，爭取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由下而上、自我管理的社會。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政府與特區政府一直壓制香港民主政制的發展，從2003年開始，千方百計強力推行第23條國家安全法；2004年，全國人大否決香港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普選；2007年，否決香港2012年實行雙普選；2012年，強硬推行國民教育科；2014年，全國人大“8.31決定”再次否決雙普選，觸發‘佔領中環’運動(簡稱“佔中”)乃至雨傘運動，要求“還政於民，落實普選”；2016年，多位參與旺角示威人士被判暴動罪成，其中一被告判囚7年，為香港開埠以來最重的暴動罪判刑；同年，6名立法會民主派被褫奪議席。2015-2018年，雨傘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因被裁定非法集結及煽惑他人參與非法

集結等罪成，反復上訴；2019年，法院裁定非法“佔中”策劃者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以及6名組織者罪成及判刑8-16個月。社會撕裂的傷口越來越深，長期積壓的憤怒，怒不可遏，致局勢風雲變幻。

市民多次上街表達政治訴求，但特區政府態度冷漠，拒絕順應民意，導致民怨沸騰，游行示威此起彼伏。6月9日，民間人權陣線舉辦“守護港反送中”大遊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宣佈100萬+1名(因抗議而死亡)市民參加。但是，特區政府一意孤行，宣佈如期在6月12日恢復二讀並提前三讀。6月12日，民間發起罷市罷工罷課“三罷”抗議行動，大批示威者包圍立法會大樓，嘗試阻止條例草案的二讀，最後政府強力鎮壓。6月15日，雖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暫緩”逃犯條例修訂，但拒絕使用‘撤回’字眼。6月16日，民間人權陣線舉辦“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提出五大要求：(1)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2)不檢控示威者、(3)追究警方以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等不當執法及向醫院索閱示威者病情的責任、(4)撤銷6.12的暴動定性，(5)立即實行雙普選。大會宣佈200萬人參與遊行。

即使有兩次百萬市民游行示威，政府都不為所動，堅持不撤回條例。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市民於金鐘與灣仔集會，要求釋放被捕示威者。部分示威者之後衝擊立法會，夜晚九時佔領立法會三小時，期間示威者控訴“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最後還將不願撤退的四名示威者帶走。7月21日，元朗發生白衣

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震驚各界，更激起民憤，久久難以平息。警察事後拘捕12人，僅控告非法集會。7月27日，即使“光復元朗”遊行申請被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但大批市民前往元朗聲援，譴責政府、警察、黑社會與鄉事派勾結，無法無天。7月28日，市民繼續舉辦抗爭活動，香港島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警方發射大量催淚彈、橡膠子彈、海綿彈、胡椒球彈驅散示威者，最後拘捕49名示威者，隨即落案控告44人暴動罪。

多次游行的示威者以年青人為主，政府不但漠視民意，而且對運動期間視死如歸的青年不問不聞，逼使更多年青人湧上街頭吶喊，追求公義，反對警察暴力，乃至反抗制度(法律與警察)的暴力。各地區抗議活動此起彼落，連儂牆遍地開花，民眾積極表達心聲，討論政治改革。抗爭運動多頭並行發生，採取平行參與的動員方式，強調“沒有大台”(自發參加、自我組織)、“不割席”(團結包容)，“上善若水”(身體力行如潮水，時而柔韌時而汹涌)，一波又一波向政府施壓，癱瘓議會制度繼續運行，劍指官僚無能、警方濫權、鄉黑草菅人命等，在運動反復向前推進的過程中，在血水相互交織之間，孕育了“集結力量改變世界”的正能量。

可是，運動期間，有一些人要求歐美國家介入，揮舞英國美國的國旗、向歐美領事求助等，可想而知，他們對中國政府與特區政府感到極度絕望，才向歐美國家求救，即使他們不一定相信歐美國家會出手相助。不過，這等行為顯示他們沿襲殖民思維，幻想歐美國家乃高等文明社會，享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比較其他所謂落後地區更加優越，因此向殖民宗主國乞求援助。但若從國際政治經濟方面分

析，歐美國家奉行國際金融資本主義，在各地要扶持的是政治傀儡與經濟附庸，終極目的乃維持歐美的金融霸權以統攝世界。因此，我們主張，這場香港市民大規模參與的民主運動，必須發展自身的力量，拒絕歐美霸權勢力的滲透、利用。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警惕中國政府煽動民族主義，轉移視線，以遮掩其包庇香港官僚箝制民主政制以及大資本家盤削市民的罪行。

儘管這場民主運動的訴求直接針對政治民主，但是，政治獨裁政權要維護的是香港承襲由來已久的殖民地超級剝削市民、有利於跨國資本/地產金融財團掠奪超級利潤的經濟制度。因此，香港雙普選的政治體制民主化的訴求，必須連結爭取合理公平、民生有保障的經濟民主化的訴求。即是說，雙普選的政改訴求，或者任何履行政治民主的主張，都必須同時連結改變香港不合理的超級剝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一時一地的社會抗爭，若要成功，必須連繫全球反對分化、排外浪潮的社會運動，因此，香港社會運動必須連結中國大陸乃至世界各地的底層民眾和社會運動，共同反抗政治強權與國際金融壟斷的資本主義經濟，從下而上爭取民主政治和社會公義。

2019年7月31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6卷第1期（總第246期）

2019年7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香港政治大事記（2003年7月1日 – 2019年7月31日）

整理: 燎原

2003年

- 7月1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籌辦遊行示威，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大會呼籲參加者穿黑衣出席。第二十三條乃就香港境內有關國家安全，即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條文作出立法指引的憲法條文。主辦方公佈50萬人參加，警方統計的人數則是35萬。
- 法案表決前夕，代表工商界及自由黨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辭職，不少工商界功能組別議員跟隨自由黨改變立場，特區政府無法在立法會取得足夠票數支持，最終終止立法程式。

2004年

- 4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出決定。《決定》認為，暫不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

2007年

- 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否決香港2012年實行雙普選，同時宣稱香港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2020年實行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

2009-2010年

- 2009年，泛民主派的公民黨與社會民主連線為爭取真普選而聯合發起“五區總辭/五區公投”，即五個立法會選區(香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及新界西)，每區均有一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辭職，產生五個空缺席位，然後按照香港《立法會條例》必須進行補選，

公民黨與社民連以爭取“儘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為選舉議題，並以“五區公投、全民起義”作選舉口號。

- 2010年1月26日，五位立法會議員正式遞交辭職信，辭職生效日期為2010年1月29日。五個選區辭職議員分別是港島區陳淑莊、九龍東梁家傑、九龍西黃毓民、新界東梁國雄、新界西陳偉業。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擔任行動的總發言人。4月7日，五名辭職議員再次報名參選。泛民主派最大政黨民主黨沒有參加“五區總辭”。原先已經準備參與補選的建制派政黨自由黨及民建聯，改為杯葛此次補選。是次政治運動亦受到建制派指責，他們表示“五區總辭”浪費公帑、違反《基本法》。行政長官曾蔭權公開表示當日不投票。補選投票於5月16日舉行，約有58萬人投票，總投票率為17.1%，比過往為低。結果五名辭職議員以大比例得票贏得議席，重返立法會。

2012年

- 教育局曾經計劃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列為必修科，於2012年9月新學年開展課程，稱為三年開展期。此學科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質疑，支持的親建制派稱此舉為“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有必要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反對的泛民主派則指《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批評《課程指引》內容偏頗、注重“情感”觸動、剝奪學校自主、強制推行，為“洗腦”教育；發起了多次的活動，例如街站、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 7月29日，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主辦“全民行動，反對洗腦，萬人大遊行”，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 9月8日，時任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宣佈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的規定，改變為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辦國民教育科及其教學方式，而開展科目的53萬元津貼維持不變。



2014年

- 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通稱“8.31決定”或“8.31框架”），當中涉及“三落閘”，即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須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1200人）、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不實行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行政長官參選人須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數目限在2至3位，以及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不實行變動。
- 9月22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及學民思潮發起學界罷課，目標是爭取真普選，要求確立“公民提名”為特首選舉提名方法、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全國人大撤回“8·31決議”及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與主事政改之官員下臺。主辦方在中文大學百萬大道舉行大專罷課啟動集會，13,000人參加，被視為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專學生罷課。由於民間人權陣線發起“還政於民，落實普選”黃絲帶行動，並獲學聯、學民思潮回應，黃絲帶被視為這次學運的象徵。
- 9月26日，學聯及學民思潮發起罷課及重奪“公民廣場”（即政府總部東翼迴旋處）行動，而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和平占中、佔領中環、占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及基督教新教牧師朱耀明因應形勢，於9月28日凌晨1時40分宣佈正式啟動醞釀1年8個月的佔領中環，並且以佔領政府總部開始，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提名方案，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撤回8月31日之政改決議，以及香港政府重啟政改諮詢、重交政改報告。
- 9月28日上午，員警開始封鎖政府總部，令示威者無法前往添馬艦支援佔領人士，導致群眾於下午衝出夏慤道等主幹道。防暴員警傍晚展開驅散行動，施放大量催淚彈鎮壓，結果激發民憤，導致示威活動在當晚蔓延至旺角及銅鑼灣等人流密集的地區，隨後更一度擴散至尖沙咀。
- 大量參與者以雨傘阻擋員警所使用的胡椒噴霧，而佔領旺角、銅鑼灣、尖沙咀行動均由市民自發，抗爭行動變成長期佔據。運動的主要象徵是黃色的雨傘，媒體因而稱此運動為“雨傘革命”或“雨傘運動”。
- 11月25至27日，旺角佔領區在遭到警方清場。
- 12月3日，和平占中3位發起人自首，但警方未有即時拘留或起訴。
- 12月11日，添馬艦、金鐘、中環、灣仔佔領區被清場。
- 12月15日，銅鑼灣佔領區及立法會示威區被清場。
- 根據中文大學民調，超過20%受訪者表示曾

參與佔領，而經推算，整場運動的參與人數約為 120 萬人，占全香港人口的 1/6。雨傘運動據統計也是香港史上第三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僅次於 2019 年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 200 萬人“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及 1989 年聲援八九民運的 150 萬人全球華人大遊行。

2015年

- 6 月 18 日，立法會表決《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決議案》，大批建制派議員在表決前提出休會及集體離席，希望爭取 15 分鐘，等待劉皇發趕回議會投下支持一票，但由於有幾名建制派議員未有離席，導致法定人數仍然足夠投票。最後，議案以 8 票支持、28 票反對大比數否決。27 位民主派議員及醫學界梁家騮投下反對票。

2016年

- 2016 年 2 月 8 日夜晚至 2 月 9 日早晨（農曆新年年初一至年初二之夜）旺角發生警民衝突事件，亦稱旺角暴亂、旺角暴動、旺角衝突、旺角大衝突、魚蛋革命、魚蛋騷亂、旺角大起義、旺角事件等。香港法院將本次事件定性為暴動，多位參與行動的示威者被判暴動罪成，部分被判囚，其中一被告判囚 7 年，為香港開埠以來最重的暴動罪判刑。
- 10 月 12 日，第六屆香港立法會的多名香港民主派議員宣誓正式就任時，因誓詞中言語和行為而發生政治風波。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監誓期間，拒絕為其中三人監誓：姚松炎、梁頌恒及遊蕙禎。由於立法會秘書長拒絕監誓，三人不能參與宣誓成為立法會議員程式。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及香港政府先後向法院提出兩次司法覆核，最後有 6 名民主派被褫奪議席，即姚松炎、梁頌恒、遊蕙禎、梁國雄、羅冠聰及劉小麗。

2017年

- 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於 2015 年 8 月被裁定非法集結及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等罪成，但原審裁判官認為他們只是表達訴求，也非很暴力，認為應予以體諒和寬容，最後只被判社會服務令及緩刑，毋須入獄。惟律政司認為刑期過輕，又指當日行為近乎「暴動」，應即判監，在上訴庭要求刑期覆核，並要求法庭為日後示威集會衍生出來的罪行，定下量刑指引。8 月 17 日，上訴庭改判黃之鋒入獄半年，羅冠聰入獄 8 月，周永康入獄 7 月。

2018年

- 2 月 6 日，終審法院裁定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上訴得直，維持原審時毋須入獄刑期，即時釋放。

2019年

-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Fugitive Offenders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2019），民間及媒體報導俗稱“逃犯條例”、“引渡條例”、“送中條例”等，是香港政府提交立法會審議的法律草案，以向中國大陸、澳門和臺灣等司法管轄區移交嫌疑人和進行法律協助。草案由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倡議。此提案源於潘曉穎命案，現時香港法律無法向臺灣移交疑犯陳同佳，同時特區政府宣稱原有逃犯移交條例不包括中國大陸及澳門亦是“法律缺陷及漏洞”，因而訂定該條例。
- 2 月 12 日下午 2 時，香港特區政府在沒有事前知會的情況下，將逃犯修例修訂草案上載到立法會的修例文件，在兩小時後，親政府政黨民建聯聯同遇害女子的母親舉行記者會促請政府儘快修例以便移交涉案疑犯陳同佳，正式啟動這條極具爭議的逃犯條例修

訂草案的立法程式，但法案的公眾諮詢期卻一反過往有最少一個月的常態，政府以極逼切修例為理由縮短諮詢期至只有 20 日。該條例若獲得通過，行政長官將可運用新訂單一個案件提交的方式移交被告，不再經立法會審議，香港法庭審轄權維持不變，有權審視案件有否表面證供，無權盤問證人。移交必須按照“兩地同屬犯罪”原則，可移交控罪須在香港也屬於犯罪行為，除謀殺罪及誤殺罪外，也涵蓋賄賂、欺詐出入境當局等 30 多項可判監 7 年或以上之控罪，香港政府亦可協助中國大陸等司法區凍結沒收在港財產。草案甫經提出，便招致社會各方質疑和關切香港司法管轄區享有的獨立司法權或遭削弱，甚至憂慮中共利用法例涵蓋範圍羅織罪名任意拘捕及引渡任何身在香港的人士到大陸，令被引渡人士面對無理的長期羈押、刑求、不公平審判及酷刑，使逃犯條例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多個宗教團體等聲明反對修例包括引渡至大陸，約 350 間中學師生和校友發起連署要求撤回修訂，佔全港中學 7 成。

- 3 月 26 日，政府在商會游說下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剔除 9 項經濟犯罪，涵蓋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環境污染、貨物進出口、電腦、關稅、虛假商品說明等，但是賄賂貪污、秘密傭金及違反信託義務等，仍屬商業罪行。申請引渡的門檻由最初建議判入獄 1 年或以上罪行，提高至可判監 3 年或以上的公訴罪行才應用，以及只限處理可循香港公訴程式審訊的個案。
- 4 月 3 日，該草案於香港立法會完成首讀。
- 4 月 10 日，西九龍裁判法院宣判，裁定非法「佔中」策劃者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54 歲)、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60 歲)、朱耀明牧師(75 歲)，聯同 6 名組織者，即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大律師(47 歲)、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及大學講師邵家臻(49 歲)、學聯前常委張秀賢

(24 歲)、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常務秘書鍾耀華(26 歲)、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30 歲)及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63 歲)罪名成立。以下為眾被告各項罪名的判刑：

- (1)戴耀廷，串謀犯公眾妨擾罪（中環公眾地方及道路）：監禁16個月；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監禁8個月；刑期：監禁16個月(刑期同期執行，下同)。
 - (2)陳健民，串謀犯公眾妨擾罪（中環公眾地方及道路）：監禁16個月；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監禁8個月；刑期：監禁16個月。
 - (3)朱耀明，串謀犯公眾妨擾罪（中環公眾地方及道路）：監禁16個月，緩刑2年。刑期：監禁16個月，緩刑2年。
 - (4)陳淑莊，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押後至6月10日判刑，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押後至6月10日判刑，刑期：押後至6月10日判刑。
 - (5)邵家臻，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監禁8個月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監禁8個月，刑期：監禁8個月。
 - (6)張秀賢，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200小時社會服務令；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刑期：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 (7)鍾耀華，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監禁8個月，緩刑2年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金鐘添美道）：監禁8個月，緩刑2年，刑期：監禁8個月，緩刑2年。
 - (8)黃浩銘，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金鐘分域碼頭街）：監禁8個月，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金鐘分域碼頭街）：監禁8個月，刑期：監禁8個月。
 - (9)李永達，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金鐘夏慤道近添美道）：監禁8個月，緩刑2年，刑期：監禁8個月，緩刑2年。
- 4 月 17 日-5 月 14 日，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鬧雙胞胎」，建制派和民主

派各自召開會議，互不承認對方合法性。民主派選出塗謹申為委員會主席建制派繼續由石禮謙主持會議；內務委員會最終通過撤銷法案委員會。

- 5月17日，香港中聯辦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先後表達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支持，聯辦曾經發出緊急通知，召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要求各界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又呼籲愛國陣營（即香港建制派）進行支持政府的輿論宣傳。其後，多名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組成“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護港安全修例大聯署”活動。
- 5月20日，特區政府要求立法會繞過法案委員會，在6月12日直上大會審議條例。
- 6月9日，民間人權陣線舉辦“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會宣稱約100萬市民參加，警方宣佈遊行最高峰期有24萬人，同時全球多地爆發示威遊行抗議修例。大遊行結束當晚，特區政府宣佈如期在6月12日恢復二讀並提前三讀。
- 6月12日，逾400家公司、過百間中學、七大大院校發起罷市罷工罷課“三罷”抗議行動，大批示威者亦於當日包圍立法會大樓，嘗試阻止條例草案的二讀，而立法會大樓內外則有大批全副武裝的防暴員警駐守。下午三時，雙方衝突加劇，警方向衝擊防線的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布袋鉛彈及橡膠子彈鎮壓，多名示威者頭部中槍，港府並將示威定性為“有組織的暴動”，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則以立法會附近爆發衝突為由決定押後會議。特區政府強力鎮壓反修例示威震驚香港及國際社會，臺灣方面，蔡英文發表聲明指逃犯條例侵害人權，重申拒絕以此修法為前提進行移交。
- 6月15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暫緩逃犯條例修訂，以便政府有足夠時間重新諮詢，向公眾作更多解說，並宣佈不會為此過程定下時限，但沒有明確表明會否撤回草案，然

而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64款，法案提交立法會首讀後，只有押後或撤回法案，並沒有林鄭所稱的暫緩，而根據《議事規則》第29款，在第六屆立法會於2020年7月完結前，政府只須就押後二讀的法案提供12整日的通知期，即可恢復條例草案二讀。

- 6月15日-7月22日，有5名青年自殺，控訴政府沒有正面回應各界人士訴求。6月15日下午4時許，梁凌傑（35歲）穿著黃色雨衣，在金鐘太古廣場4樓平臺懸掛抗議標語，要求撤回條例及釋放被捕人士，後來墮樓身亡。6月29日，香港教育大學學生盧曉欣（21歲），從粉嶺嘉福邨福泰樓的高處墮下，傷重不治。6月30日，文員鄺幸恩（29歲），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4樓平臺墮下，搶救不治。7月3日凌晨，麥小姐（28歲），在長沙灣住所墮樓身亡。7月22日，范先生（26歲）在沙田廣源邨廣柏樓高處墮下昏迷，搶救不治。
- 6月16日，民間人權陣線舉辦“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提出五大要求：(1)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2)不檢控示威者、(3)追究6月12日街道佔領時警方以催淚彈和橡膠子彈不當執法及向醫院索閱示威者病情的責任、(4)撤銷6月12日的暴動定性，(5)林鄭月娥下臺。大會宣稱200萬人參與遊行，警方指參與人數為高峰時在原定路線有33萬。
- 6月16日晚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修例致歉，但沒有回應遊行主辦方民陣的任何一項訴求。
- 6月18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開露面，親自向市民致歉，但沒有正式撤回修例。
- 6月21日，民間與大專學界宣佈行動升級，號召翌日早上7時在金鐘包圍政府總部、特首辦、禮賓府、灣仔香港員警總部、以至罷工、罷市、罷課、不合作運動及堵路等。當晚，特首辦回應稱，行政長官在6月18日已

向市民致歉和回應其他事宜，希望市民明白及理解。政府宣佈政府總部暫停開放

- 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凌晨起，群眾自發於金鐘、添馬與灣仔一帶集會，要求釋放被捕示威者與阻止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升旗典禮舉行，示威者計劃佔領金紫荊廣場，與阻止他們前往的員警發生衝突。下午有示威者在金紫荊廣場下半旗致哀。部分示威者之後衝擊立法會，一度與警方發生衝突，後於夜晚近九時進入大樓。立法會首次被佔領三小時，示威者塗黑區徽，展示黑洋紫荊旗及香港旗，以示議會不反映民意，並宣讀《香港人抗爭宣言》，要求2020年普選立法會，不願香港為民主、自由、公義再添亡魂。7月2日近子夜時分，大部分在立法會內的示威者已撤去，警方施放多枚催淚彈驅散在立法會外一帶聚集的人群。
- 7月9日，林鄭月娥稱逃犯條例的修訂已經“壽終正寢”，即使撤回也可將條例草案在三個月後再提交立法會，但民主派和反修例人士批評林鄭為面子而拒絕按《議事規則》撤回修例，條例草案實際上仍處於押後狀態，又指出香港法例及立法會議事規則均沒有“壽終正寢”四字，批評林鄭的說法只是玩弄文字遊戲，不尊重立法機制。
- 7月2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第六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大型遊行。按照警方的安排，遊行起點設在維多利亞公園，終點位於盧押道。部分遊行人士超越警方指定路線，直接前往金鐘佔領夏慤道，其後抵達位於西環的香港中聯辦。示威者在中聯辦外宣讀721宣言，並在外牆寫上訴求及侮辱歧視性言論，又向中國國徽投擲墨水。警方向示威者發射了55枚催淚彈、5發橡膠子彈，和24發海綿彈驅散示威者，多人受傷。警方在無任何警告下於中區警署外的行人天橋上瞄準示威者頭部開槍。
- 7月21日夜晚及7月22日凌晨，新界元朗區發生襲擊事件。一批身穿白衫、手繫紅繩之疑似黑社會成員於元朗雞地及港鐵元朗站聚集，以“教訓歸家的示威者”為名持械無差別襲擊途人。市民報案後長達39分鐘未見任何警員到場，附近警署拉下閘門。事發後警員指沒見到有白衫人集結的南邊圍村有人持械，當晚入村調查後亦沒有拘捕任何施襲者。警方被批評早已知情及故意縱容鄉紳及黑社會勢力在元朗發動襲擊，更有社會輿論指事件涉及“警黑勾結”。有輿論稱這事件為恐怖襲擊。無差別襲擊事件中一共至少45人受傷，當中包括孕婦，傷者中1人危殆，5人重傷。
- 7月22日凌晨，香港特區政府發出聲明，譴責上環及元朗的暴力事件，針對上環的衝突直斥是令人髮指，而對元朗暴力事件僅表達是不能容忍。22日下午3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聯同多位元司局長召開記者會，拒絕將元朗襲擊事件定性宗為暴動。相反，民間人權陣線、部分互聯網傳媒、學者、前局長及社福界組織均指出穿著白色上衣並持有武器的施襲者，是有預謀在鐵路系統針對平民無差別地襲擊，企圖令民眾產生恐慌，因此稱事件可定義為恐怖襲擊。
- 7月22日-25日，因元朗無差別襲擊事件警方共拘捕12人，僅控告非法集會。
- 7月27日，“光復元朗”遊行申請被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下午3時，市民於水邊村遊樂場聚集和開始起步，4時多步行至元朗西鐵站，警方在場戒備。有民眾在南邊圍村外聚集，並爆發警民衝突，警方發射催淚彈，海棉彈及橡膠子彈，以及使用警棍和胡椒噴霧鎮壓。有多名市民、記者和社工受傷，亦有民居簷篷和西鐵架空路軌被催淚彈擊中。9名傷者送往治理，其中5人情況嚴重。晚上11時，大部分民眾散去。

- 7月28日，香港島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事件原定是遊行，路線本為由遮打花園遊行至中山紀念公園，目的是追究7月21日元朗警黑勾結。但市民走出馬路，同時該遊行被發出反對通知書，其間示威者設置障礙物，燃點路上雜物及大廈外牆棚架，將燃點紙盒的手推車衝向警員，同時利用磚頭、弓箭、高處投擲不明液體等還擊，警方7時開始展開掃蕩行動，與示威者爆發激烈的拉鋸戰，發射大量催淚彈、橡膠子彈、海綿彈、胡椒球彈驅散示威者，速龍小隊多次出動直接制服和拘捕多名示威者，直到12時，示威者逐步散去，事件造成16人受傷以及49人被拘捕。
- 7月29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是港澳辦自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風波以來首度公開回應事件。發言人楊光表示，中央政府堅決支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支持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人士。
- 7月30日，警方落案控告7.28中西環衝突中44人暴動罪，其中一名被控暴動罪的33歲男子被加控一項襲警罪。一名24歲男子則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有網民發起到葵湧員警的示威行動，要求警方釋放於運動期間的被捕示威者，早日拘捕元朗襲擊事件中的施襲者。警方施放胡椒噴霧驅趕示威者，而警長持雷明登870霰彈槍於港鐵葵芳站一帶指向示威者，至7月31日凌晨近1時40分，示威者方結束對峙與完全撤退。
- 7月31日，東區裁判法院進行7.28上環衝突案件的第一次提訊。45名被告一共被分為四宗案件處理，當中44人被控至少一項暴動罪，其中一人加控一項襲警，一名被控一項藏有攻擊性武器。所有被告獲准保釋，大部分人需遵守宵禁令、期間不得離港。控方申請將四宗案件押後至9月25日再開庭審

理。近千市民在急風暴雨下，到法院外聲援。

- 44 位被控暴動罪的市民姓名及年齡：
陳子謀（24）、湯偉雄（38）、杜依蘭（41）、
李宛叟（16）、張智麟（21）、陳梓康（28）、
鍾泓洋（20）、徐慶鈞（20）、陳希雋（24）、
崔耀明（21）、林少鋒（24）、蔡澤新（40）、
楊智昇（20）、林勝如（19）、黃頌恩（22）、
黃錦珊（20）、李少康（21）、周錦濤（18）、
莫卓輝（33）、黃飛鴻（19）、簡健煌（24）、
張嘉聰（20）、譚詩妙（23）、羅萬泳（22）、
蔡寶如（23）、譚伊婷（25）、陸映慧（27）、
黃柏賢（21）、陳偉林（21）、甄凱盈（22）、
陳澤峰（22）、布紫晴（24）、何栢耀（17）、
梁志鵬（20）、楊位醒（31）、彭雨彤（20）、
劉耀銓（28）、廖頌賢（30）、陳永琪（28）、
廖天駿（28）、林皓正（22）、廖紫婷（19）、
李樹樺（21）、胡嘉俊（21）、張零曦（19）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及香港報章



劍指地產富豪以濟貧民 高峽

香港官僚包庇國際金融資本及本地地產霸權，造成物價騰貴，生活困苦，民怨沸騰。根據《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第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換言之，中國政府及特區政府上下一致，以法律及行政手段，縱容大資本家特別是大地產商剝削香港市民，以及鞏固大資本家的財產。

香港民眾生活有多苦，可從以下數字得到印證。根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分別為新加坡、香港和巴黎，得分均為107分。香港在上一年度排名第4，今年則大幅躍升3位，超越瑞士蘇黎世；新加坡則已連續5年位居榜首，這兩個城市的生活成本比美國紐約高出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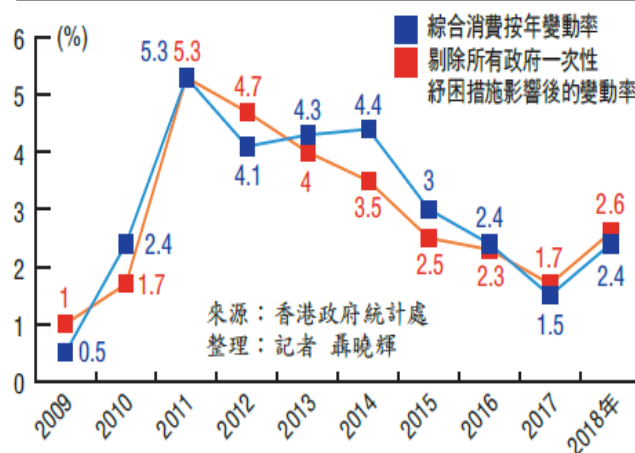
生活成本指數全球排名前10的城市			
城市	生活成本指數 (紐約=100)	全球 排名	排名 變化
香港	107	1	↑3
巴黎	107	1	↑1
新加坡	107	1	—
蘇黎世	106	4	↓2
日內瓦	101	5	↑1
大阪	101	5	↑6
首爾	100	7	↓1
哥本哈根	100	7	↑1
紐約	100	7	↑6
特拉維夫	99	10	↓1
洛杉磯	99	10	↑4

資料來源：英國經濟學人智庫
整理：記者 敖敏輝 文匯報

根據香港統計處資料顯示，2011年年度通脹率高達5.3%，為過去10年最高，其後逐步回

落至2017年的1.5%，惟2018年通脹率又回升至2.4%。2019年開始，衣食住行的成本不斷上升，港鐵每程3%的車費回贈於元旦結束，港鐵車費正式加價3.14%，城巴及新巴亦於1月20日起平均加7%及5.6%，大欖隧道由元旦起加價8%至10%。中電於2018年10月起將每度電加價2%，港燈於2019年元旦大幅加價6.8%。

香港消費物價指數在過去10年的按年變動率



物價最騰貴非樓價莫屬。國際調查機構Demographia採集截至二〇一八年第三季全球8個國家309個國際大城市的數據，統計91個人口逾100萬人的頂級大都會樓價數據，當中有29個大都會達到樓價「嚴重不可負擔」的水平。香港大幅拋離其他城市，樓價中位數為716.9萬元，比2018年的619.2萬元，上升約15.8%，上述最新樓價為香港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34.3萬元的20.9倍，相比2017年的19.4倍更高。加拿大溫哥華樓價成為全球第二難買樓城市，中位數比率為12.6倍，而悉尼則以11.7倍排第三。香港市民捱貴樓的苦況，遠遠拋離美國紐約、英國倫敦等主要市場。



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排名

排名	城市	樓價佔家庭年收入比率(倍)
1	中國香港	20.9
2	加拿大溫哥華	12.6
3	澳洲悉尼	11.7
4	澳洲墨爾本	9.7
5	美國聖荷西	9.4
6	美國洛杉磯	9.2
7	新西蘭奧克蘭	9.0
8	美國三藩市	8.8
9	美國檀香山	8.6
10	英國倫敦	8.3

註：5.1倍或以上被界定為「嚴重不能負擔」

香港百業唯地產一枝獨秀，社會財富自然集中在地產商手上，造就世界超級富豪。2017年1月，彭博億萬富豪指數公佈全球500富豪榜，超過一半上榜的香港富豪全來自地產，這12個地產大亨身家高達1190億美元(約9282億港幣)。

《福布斯》2018年香港富豪榜排名裏，前十大富豪，即李嘉誠、李兆基、郭炳江兄弟、劉鑾雄、吳光正、郭炳湘全是大地產商。

香港十大富豪排名

最新排名 (去年排名)	富豪	淨資產	按年變動	所屬集團
1(1)	李嘉誠	313億美元	-6.57%	長江實業
2(2)	李兆基	239億美元	-4.4%	恆基地產
3(3)	鄭裕彤	150億美元	--	新世界發展
4(4)	郭炳江、郭炳聯	149億美元	+1.36%	新鴻基地產
5(6)	劉鑾雄	148億美元	+35.7%	華人置業
6(11)	潘蘇通	122億美元	+100%	高銀地產
7(5)	呂志和	80億美元	-40.3%	銀河娛樂
8(8)	吳光正	75億美元	-5.06%	會德豐
9(10)	郭炳湘	71億美元	+5.7%	長江實業
10(7)	米高·嘉道理	60億美元	-32.5%	中電控股

富者不事生產，吸附民眾繳納的超級地租以自肥；貧者卻無立錐之地，人數也越來越多。根據2018年11月政府發布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7年全港貧窮人口有137.7萬，貧窮率達20.1%，貧窮人口再創過去9年以來新高，即平均每5個港人就有一個屬貧窮人口。由2014年開始，即使計算政府所給予的扶貧援助和公屋

支持，香港的貧窮人口和貧窮率仍在穩步上升，換言之，香港經濟發展沒有惠及社會基層，其生活水平持續下滑。香港2017年基尼系數是0.539，聯合國的基尼系數警戒線是0.6。香港最貧窮10%家庭月收入為2560港幣，家庭住戶月收入在15,000港幣以下的占全港人數的36.4%，而李嘉誠一人身家，就接近香港40%的GDP。

2017年，香港只有44.8%的人口居住在公屋，星加坡是60%。根據房委會提供的一般家庭平均輪候公屋時間，從2011年起，公屋輪候時間不斷上升，更於2018年3月打破5年的關口，再創19年新高。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刊物《數據透視》顯示，在社會福利署的登記露宿者人數從2011至2012年度的511名，倍升至2017至2018年的1,127名，反映7年間，露宿者數字持續上升。70歲或以上的露宿者人數增加近2倍。最普遍的露宿原因是無力支付房屋租金。截至2018年3月，35%的露宿者已露宿5至10年，當中22%的露宿者，更已露宿逾10年。

長遠來說，必須針對金融資本主義危機產生的社會矛盾，對症下藥，將地產資本家所掠奪的大量財富還給貧苦大眾，同時，興建公共房屋，扶持中小企業實體經濟。所謂“時代革命”的經濟成份，乃關乎從根本上實行社會財富均分，民眾與土地財產建立合理關係，締造百姓安居樂業的生活條件。否則，越來越多赤貧而絕望的青年將會湧上街頭拼死求生。

參考資料

1. 盧麒元，〈香港的超級地租〉，<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123.html>
2. 盧克文，“這一刻，是香港178年來最新的挑戰”，<https://mp.weixin.qq.com/s/fav2F1TR7txxTrfEe7RZ9g>
3. 區禮城，〈露宿者人數7年翻一翻 70歲以上大增兩倍〉，《香港01》，<https://www.hk01.com>
4. 楊玉川，〈大灣區是香港發展的出路〉，《香港商報》，2019-02-28。https://www.hkcd.com/content/2019-02/28/content_1126040.html
5. 〈香港生活成本全球最貴〉，<http://pdf.wenweipo.com/2019/03/20/a06-0320.pdf>

中國官僚買辦恭迎國際金融豺狼 破謎

2019年3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表演說，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勢在必行，針對當前金融開放水準仍有待提高的局面，要做五點考慮。堅持金融服務業開放、金融市場開放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相互配合，協調推進；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完善金融業開放的制度規則，實現制度性、系統性開放；改善營商環境；完善金融監管。

根據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及2019年版），第八項，金融業，第22條，證券公司的外資股比不超過51%，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資股比不超過51%。（2021年取消外資股比限制）；第23條，期貨公司的外資股比不超過51%。（2021年取消外資股比限制）；第24條，壽險公司的外資股比不超過51%。（2021年取消外資股比限制）。

易綱指出，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取得明顯進展：瑞士銀行對瑞銀證券的持股比例提升至51%，實現絕對控股；安聯（中國）保險獲准籌建，成為我國首家外資保險控股公司；美國標普公司獲准進入我國信用評級市場；美國運通公司在我國境內發起設立合資公司，籌備銀行卡清算機構的申請已經審查通過。

易綱談到金融市場開放方面，中國按照國際標準，持續推動債券市場、股票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對外開放，擴大跨境投資融的管道，完善相關制度安排。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競爭力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受到國際市場的普遍肯定和認可。2018年6月，我國A股正式納入MSCI指數。2018年9月，富時羅素宣佈將A股納入其指數體系。2018年，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市場增加近6000億元，目前總量達到約1.8萬億元。彭博公司確認將於2019年4月起將中國債券納入彭博巴克萊債券指數。

5月30日，被譽為“中國金融風向標”的金融街論壇年會在北京召開，北京市市長陳吉甯在會上表示，今年1月底，國務院批復同意北京繼續開展和全面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北京把金融業開放作為新一輪服務業高水準開放的重

點，正在實施的177項開放舉措中，涉及金融業的有47項，佔比超過四分之一，涵蓋資本帳戶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外匯管理等方面。陳吉甯說“過去幾年，我們積極支持一些評級公司，還有一些國際上先進的金融機構在北京落地。取消北京市企業銀行帳戶的許可，優化北京金融環境，在中關村開展資本專案收入結匯支付便利化和外債便利化的政策試點，積極支援北京市試點跨境人民幣業務，北京在全國率先實現動產擔保統一登記和統一查詢，提升了企業獲得信貸的便利度。”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金融業在整個服務業中舉足輕重，金融業進一步開放對整個北京乃至全國服務業的發展也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兆星指出，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外國銀行、保險機構在華機構的數量不斷增長。截至今年4月份，共有來自54個國家和地區的215家外國銀行在華設立41家外國銀行法人，115家外國銀行的分行和153家代表處，外資銀行的營業機構已經達到982家。同時，共有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外保險機構在華設立59家外資保險機構和14家外資保險仲介機構，下設分支機構達1800多家。共有來自22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外保險機構在華設立了132家代表處。“外資銀行和外資保險機構充分發揮了跨境經營優勢，不斷加大在華資源投入，不斷豐富產品服務體系，其參與中國經濟發展和提供的服務已遠超出其資產份額所反映的價值。”

有學者批評，金融開放政策必然導致國家喪失金融主權，淪為國際資本的金融殖民地。世界一體化和經濟虛擬化過程中的金融戰爭，實際上是新一輪殖民主義——經濟殖民主義浪潮的興起，對發展中國家銀行的控股，屬於新的殖民地形式。隨著虛擬經濟的發展，出現了第三種隱蔽型的殖民地形式，就是通過控股對方的銀行掌握其全部社會財富，把對方國家全部國民都變成財富的名義佔有者。這些財富流向哪裡價值幾何，都有各種各樣的金融指數來決定，而這些金融指數的漲跌變化，完全由這些控股銀行和當地政府官員決定。當初八國聯軍幾十年從中國搶劫了13億銀元，引起中國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

過銀行股賤賣，外資一年就從中國掠走上萬億元，國人卻沒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虛擬財富的流動大家都感覺不到。

據說2005年6月美國銀行投入中國建設銀行30億美元，短短2年後，美國銀行在中國建設銀行的直接和潛在獲利已達到320億美元，足以抵消該行在次貸危機中損失的近40億美元。美國本來通過美國銀行首席財務官埃文斯提出把外資對中國銀行的控股比例由25%提高到49%，結果卻是中國乾脆取消全部限制，成為金融領域完全不設防的國家。

中國全部銀行資產約50萬億人民幣，按照巴塞爾協議8%的資本充足率規定，佔有這50萬億銀行資產需要4萬億資本，按照中國銀行資本充足率不過5%計算，實際上只需要2.5萬億資本，根據中國銀監會關於持股比例達到25%即屬於控股的規定，控股2.5萬億資本只需要6千多億人民幣，相當於9百多億美元，就可以控股整個中國銀行資產，進而控制整個中國經濟。而目前美國銀行、花旗銀行等銀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資本都超過9百億美元，從邏輯上來說，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個中國銀行業，進而控制整個中國經濟。

美國自1991年通過專門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銀行獲准在美國紐約設立分行，期間整整16年中資銀行無一家能夠進入美國市場；而與此同時，有20多個國家近80家外資銀行在我國30多個城市建立數百家分行和法人機構，參股控股中國銀行的外資金融機構30多家，同時還有約150家外資證券、基金等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在上述所有這些金融機構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

另外，楊斌提出，中國推進銀行業和證券市場的改革，不應搞美國宣導的金融自由化，迷信“國際接軌”盲目開放市場。美國宣揚的所謂“規範經濟理論”，貌似中性卻暗藏強烈商業動機，譬如國內盛行一時“全流通”理論，主張任何行業的國有企業資產，都應不受限制地進入市場自由流通，由國內、外投資者自由地進行買賣，這意味著給股市形成巨大拋盤壓力，必然導致股民恐慌和股市暴跌，結果深滬股市蒙受上萬億元損失，證券業陷入全行業虧損困境。他認為目前，中國應警惕國際資本的漸進性侵蝕，逐步削弱經濟安全防線繞過政府管制，獲得突破口後發動全面競爭攻勢，來不及預防就迅速產生雪崩效應，

像阿根廷等國那樣突然爆發金融危機，進而觸發政治危機和的社會動亂。

楊斌追溯歷史說，美國收買第三世界國家的官僚買辦，出賣本國經濟金融主權和戰略利益，並不是全球化時代才有的發明創造，早在19世紀殖民主義時期就廣泛運用。舊中國，西方跨國銀行曾廣泛進入開設機構，其競爭造成大量中國銀行倒閉破產，嚴重遏制中國工業的長期發展。

早在1920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章批判買辦階級，“所謂中國資本家都直接或間接是外國資本家的買辦，只能幫著外國資本家來掠奪中國人，只希望他們發達起來能夠抵制外國資本家，能夠保全中國獨立，再過一兩世紀也沒有希望”。

黃逸峰在1964年發表的《關於舊中國買辦階級的研究》論證說，買辦除幫帝國主義在中國構建商品推銷網、原料收買網和金融控制網外，還有為中國反動政府向帝國主義借債擔任仲介等惡行，舉例說，“楊坊、胡光墉、盛宣懷、虞洽卿、周學熙、梁士詒等買辦和買辦階級分子都先後為軍閥或反動政府向帝國主義貸款。他們從經手外債借貸中取得了大量回扣。黃逸峰批判舊中國的買辦階級，“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極端落後和反動的，它同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買辦階級同“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結合在一起，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束縛和破壞作用”。

21世紀新中國的買辦階級正在重複舊中國買辦階級的套路，大舉引入國際金融豺狼，嚴重威脅國民的生命財產。

資料來源:

1. 中國將成為有史以來國有銀行任憑外資控股的唯一國家， 2018-03-18， <https://mp.weixin.qq.com>
2. 楊斌，銀行控股爭論參考：阿根廷的銀行開放與金融危機， 2018-03-12， http://www.globalview.cn/html/economic/info_23279.html
3. 易綱：繼續擴大金融業開放，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全文） 2019-03-24， <https://www.yicai.com/news/100146419.html>
4. 擴大開放全面提升金融業發展水準，2019-05-31， http://www.gov.cn/xinwen/2019-05/31/content_5396256.htm

社會主義革命和拉丁美洲統一

茲比格涅夫·馬欣·考瓦勒斯基

六十年代的古巴革命標誌著拉丁美洲革命的開始，標誌著拉丁美洲統一這個烏托邦理想的恢復和重整。從那時起，我研究了這個烏托邦理想在古巴，我的祖國波蘭和法國的起源，歷史和實效。我願與你們分享我的思考。

有人曾經說過，服務於拉丁美洲寡頭政治和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強權的三流作家捏造歷史傳說，把‘解放者’描述成創造了幾十個而不是一個非正常國家的狂熱黨徒。而且“官方歷史”這一真正醜惡的偽造在於這個事實：在西歐和美國，各個國家繼續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存在，而在拉丁美洲，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失敗而出現的政治體制則被視為截然不同的非正常國家。

無論誰是作者，這是個很好的說法。縱觀世界，拉丁美洲與阿拉伯世界都有一個不平常的特殊性，即四分五裂。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一書中，里昂·托洛茨基就有關國家的問題上說，“語言是人際溝通最重要的，因此也是產業最重要的工具。它隨著整合國家的商品交換的成功而成為全民的。在此基礎上，民族國家作為表演資本主義關係最方便並且可圖利的常規舞臺而搭建起來”。[1]

這是事實，許多民族國家並不涵蓋使用其民族語言的全部領土而且 ---- 儘管在相當特殊的情況下 ---- 有時兩個鄰國有相同的民族語言。

但拉美所發生的事情非常特別。在民族語言相同或相似的連片領土上，在民族國家形成的典型時代，不是一個而是二十個左右的國家形成了。反常是無可否認而且規模巨大的。在這種反常情形裡，拉丁美洲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受制於人的被剝削未開發的週邊，它的條件被落實具體化。因此，在拉丁美洲，祖國是美洲這樣一種

思想定期復活是很自然的，就像阿拉伯世界也有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存在一樣。

“在德國，容克道路是可能的，因為閔采爾的道路已失敗”，勒內·紮瓦里塔·梅爾卡多說，指的是這個國家農民戰爭的失敗，以及後來的，遵循所謂普魯士寡頭政治道路的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中心，所有道路，無論是自下而上引導的完全的民主道路----這條路同一個積極資產階級革命導致的資本主義發展有關，抑或是寡頭政治道路----這條路亦步亦趨地跟隨自上而下施加的被動的半資產階級革命，它們都導向一個獨立的發展。

不過，在寡頭政治道路的週邊，可能只有‘次資本主義發展’的附庸之路。就如紮瓦里塔·梅爾卡多表明的，如果強加於拉丁美洲的正是這條路，那是因為尚未採取圖派克·阿馬魯和圖派克·卡塔里道路的緣故。[2]

1780年至1781年，與第一次北美革命即所謂北美第十三英國殖民地獨立戰爭的時間相同，在印加文明的領土上，在圖派克·阿馬魯和圖派克·卡塔里的領導下，爆發了與土著農民的激進起義相結合的，爭取獨立的偉大起義。北美革命基本上是政治性的，相比之下，安第斯起義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個真正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就它的階級組成和其本身的文明基礎而論，它比任何後來的獨立運動有更為巨大的潛力，為拉丁美洲的統一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獨立的發展，奠定基礎。

西班牙殖民政權對印加文明的野蠻鎮壓和破壞，敲響了一場革命的喪鐘，這場革命有可能改變該半球西班牙或美洲伊比利亞部分的歷史過程。

在北美，發生在英國殖民地的獨立戰爭獲勝，並導致了殖民地的統一 ---- 具體地說，導致一個聯邦。但在新聯盟的南部各州，奴隸制的維持和擴大，阻止了未來80年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民主和獨立的抑或寡頭和附庸的-----被確定採納。

在拉丁美洲，發生在19世紀上半葉的一些獨立戰爭，雖然取得勝利，但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卻是失敗的：他們沒有成功地自我轉變為拉丁美洲民族革命，建立一個拉丁美洲聯盟，或者至少是支持這個聯盟形成的堅定基地。不是形成一個聯邦或起碼是邦聯，擺脫了西班牙枷鎖的美洲支離破碎，成為一些國家的烏合之眾。

緊接這個意義上的失敗，獨立戰爭也沒有導致新共和國內的殖民地被抑制。與此相反，獨立戰爭後，經過無數內戰，統治階級和殖民地方式的剝削保存下來。西蒙·玻利瓦爾省曾有一個不好，但鮮明的預感：即在北美，舊英國殖民地的聯盟和前西班牙帝國的破碎將決定他們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美國將統治拉丁美洲。基於這個原因，他期望在單一民族內的前西班牙殖民地的統一。

在合眾國，第一次美國革命的80年後，北方南方間爆發內戰，北方各州在剝削工薪勞工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南部主張分離的各州通過剝削奴工發展資本主義，內戰轉化成為國家再統一和廢除奴隸制的革命戰爭。多虧了這一可怕的戰爭，美國最終贏得了全國團結。它讓資本主義發展的民主和獨立的道路壓倒了寡頭政治和附庸的道路。如果南部主張分離的各州贏了，這並非不可能，也並非未必會發生的，那末後一條道路將獲勝，美國會分裂並呆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週邊。南方失敗後的少許事件大大地揭示了美洲兩部分不同的，甚至對立的歷史過程。

在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寡頭的三重聯盟在世界霸權英國的支持下，領導了一場對巴拉圭的可怕的種族滅絕戰爭，導致在獨立戰爭中顯現出來的，為確保資本主義獨立發展而作

的唯一嘗試完全和不可逆轉的毀掉。

該嘗試，其魯莽的程度一如它給地方帶來的災難，其悲劇結局向我們表明兩件事。第一，在這個時代，在世界資本主義系統的週邊附庸拉丁美洲，如果不同這個系統作長期決裂， ----如同獨立巴拉圭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總督何塞·加斯帕爾·德·弗朗西亞領導的那種根本的決裂，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不可能的。第二，這個時候，在世界體系的拉丁美洲這個週邊中的單獨一個國家裡，一個持久的獨立發展已經是不可能的。

針對任何聽天由命的觀念，比如所謂美國和拉丁美洲注定要遵循他們已有效地行走過的道路，應當記得，這種態度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正如奧古斯汀·奎瓦的觀察，“歷史不是一個有目標的運動，有一條道路在前面可以追溯，而是一台階級衝突的戲”。“因為這種宿命論只是精英主義的另一邊，有關19世紀拉丁美洲革命運動歷史和民主選擇的知識，仍然是‘歷史的私生子’”。[3]

當時歐洲的各大列強都非常清楚， -----正如法國總理弗朗索瓦·基佐所說的-----這是“歐洲黨”和“美洲黨”之間鬥爭的最後結果，它將決定拉丁美洲的命運。

在美國，“美洲黨”壓倒“歐洲黨”的勝利是必然的嗎？而在拉丁美洲情況恰恰相反？不，該兩宗案件中沒有什麼是命中註定或預先確定的。是階級鬥爭和內戰戰場上勝利的一方決定的。

在墨西哥“美洲黨”黨魁貝尼托·華雷斯領導下進行的勝利卓著的戰鬥-----改革，內戰和全國抵抗戰爭-----注定要在波菲裡奧·迪亞斯政權下的墨西哥資本主義的超級寡頭政治的和極度受縛的現代化中結束？不，他們可以以一個根本不同的方式結束。

可能性的計算，包括了在美國和墨西哥幾乎同時發生的“美洲各黨派”在戰爭中的勝利的影響，連同他們政府的聯合支持，正在朝南半球迅速擴

大，挑起了大陸“美洲黨”同“歐洲黨”堡壘的決定性衝突：這個堡壘是曾幾何時粉碎巴拉圭的三重聯盟。但是，這並不是所發生的情況，“改革期間，資產階級民主選擇的失敗”，奎瓦說，“在任何情況下，把整個拉丁美洲的航道，沿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極端保守----“寡頭政治”----的路徑加固，這正好吻合世界體系已進入的帝國主義階段，確定著我們歷史的一個新時期。”[4]

兩件事，應該是很清楚的。首先，我們是在談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時代。其次，這個時代曾是封閉的，在美國奴隸主的“歐洲黨”失敗後，在墨西哥人民向歐洲資產階級施以巨大打擊，在墨西哥處決篡權者哈布斯堡以及三重聯盟的“歐洲黨”摧毀巴拉圭以後，僅僅幾年就在世界範圍內完全封閉。結束它的是巴黎公社：第一次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革命，雖然只是一個過渡方式。

在上述時代的末尾，我們因而有分佈於該半球兩部分之間兩個系列的邏輯和歷史相關性：北美的國家統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民主獨立的，而且國家向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推進；拉丁美洲的國家分裂，資本主義的不良發展是寡頭和受牽制的，而且拉丁美洲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處於持久的附庸地位。

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這兩個系列的相關性產生的東西莫過於玻利瓦爾省所預期的：在該半球，美國的發達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欠發達資本主義之間的兩極化，由統治和從屬的關係不可分割地聯合著。就像托洛茨基後來會說的那樣，拉丁美洲一直受到來自美國的“國家剝削，那是完成並鞏固階級剝削的剝削”。

在世界資本主義這個框架內，並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這兩個系列相關性的結盟是不可動搖的。

雖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時代在1871年最終結束，世界上每一個尚未完成這些革命歷史任務的國家，仍然留在沒有完成的狀態。這個

時代不可逆轉的結局和充分實現這些任務的耽擱，兩者之間的矛盾，意味著這些任務再也不能由資產階級或其任何部門或派別加以解決。

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隨後的整個歷史過程充分證實了這一點。現在，面臨著拉丁美洲資產階級在完成其歷史任務方面的破產，正是巴黎公社已經宣佈了其不可避免的崛起的革命階級，應完成它一度建立過的自己的政權權力。

一如既往，大拉丁美洲家園的構思，存活於革命拉丁美洲民族主義者中間。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期間，拉丁美洲乃至整個殖民地附庸週邊所出現的最著名的革命家，何塞·馬蒂，把它作為一個革命戰略而啟動。

佩德羅·巴勃羅·羅德里格斯·阿因此這樣形容這項應用於古巴的戰略：“戰爭是為了獨立，但也包括其他的目標：這只不過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政治戰略的路標，它開始於古巴，會繼續貫穿於波多黎各的獨立和拉丁美洲的漸進統一過程，面對美國的擴張企圖，西印度群島是首當其衝的防洪壩。

這一戰略將保證消除拉丁美洲社會中西班牙殖民主義的所有遺跡，避免建立新形式的殖民主義。用我們時代的語言，人們可以稱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大陸戰略(...)。有一點是明白無疑的，即在這條道路上，僅玻利瓦爾省一人走在馬蒂之前，當時，他要求一個拉丁美洲聯盟強大得像在北美形成的聯盟那樣。

然而，兩人的時代有很大不同；玻利瓦爾省領導南美洲獨立戰爭的時候，美國開始把他們的領土擴張到太平洋沿岸，掠奪印地安人的土地，而英國則主導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馬蒂經歷過的時代，是美國從壟斷資本主義前期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決定性時期，這個時期保證了它在加勒比國家的霸權，並把它投入到同南部大陸的歐洲人的競爭裡。在玻利瓦爾省時代或多或少是遙遠可能性的東西，在馬蒂時代成了一個現實。”[5]

整個馬蒂的工作所作的參考表明，對他來說，拉丁美洲的統一也將意味著在拉美範圍內形成一個單一的“新共和”，也即是馬蒂自己所界定的，這種共和從根本上不同于傳統的拉丁美洲共和國，因為它將打擊內部殘存的殖民地。

同邏輯上可能的期待相反，拉丁美洲工人運動及其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沒有辦法用玻利瓦爾省和馬蒂的大家園思想作恰當的翻譯解釋。屬於第二個國際的，第一批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政黨忽視了他們。可能因為有這樣的猜想，即共產主義運動將與社會民主黨的遺產徹底決裂。

受玻利瓦爾省和馬蒂的影響加入運動的革命鬥士，比如胡利奧·安東尼奧·莫拉，被十月革命勢不可擋地吸引住，信心十足地期望這一點。但他們很快就感到幻滅了。

問題是在1928年共產國際第5次代表大會上首先提出的。共產國際的拉丁美洲事務主要負責人，瑞士共產主義者儒勒·恩貝爾-德羅茲，建議共產主義運動同意把拉丁美洲的聯邦工農共和國聯盟的建立作為其主要的革命任務之一。他的建議，明晰且不可或缺，挑起了一個敵對的反應，而他被指責為，對一個像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PRA）那樣的運動做明確的暗示，跟隨著“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拉丁美洲主義”走。在同一會議上，共產國際把爭取歐洲社會主義合眾國的鬥爭從其計畫綱領中剔出了。

蘇聯斯大林官僚權力的崛起，以及服從它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引發了無數災難性後果，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結果，共產黨同列寧托洛茨基領導下所採取的反帝統一陣線和革命民族主義者同盟的政策破裂 ---- 這個破裂，極大地影響了拉丁美洲革命運動的發展。回想梅拉所作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革命民族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革命民族主義是拉丁美洲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潮流，梅拉在其中說，他“想要一個自由的國家，以杜絕內部寄

生蟲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因為認識到了任何一個社會的主要公民，是那樣一些人，他們以日常工作幫助提升社會，而又不剝削利用他們的人類同胞。”[6]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使用這個詞。

面對共產國際的斯大林化，最清醒的思想家和革命民族主義活動家，才會維持這種想法，即在爭取解放及掙脫帝國主義統治的各個基本任務中，拉丁美洲的統一應作為其中的一項。但是，斯大林丟棄和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原始綱領，按照十月革命的直接傳統，這場革命的列寧以外的另一主要領導人，起用了被共產國際主動否決的觀念。托洛茨基不是只用了它，而且把它作為他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決定性貢獻----不斷革命論----的基礎。

在俄羅斯，不僅直到1917年10月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候，而且差不多一年後，直到1918年秋天，革命的社會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的，但其直接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取得了政權，無產階級首先進行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這個國家還沒有完成的各項任務，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即解放被俄羅斯帝國壓迫的民族，以一個不間斷的或永久的方式，把這些任務從後面提前到第一批的社會主義任務。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最初是為俄羅斯革命精細設計的，後來他把它推廣到了所有的不發達的，殖民地和非獨立國家。據他表示，無產階級在這些國家上臺的可能性，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階級在國家經濟上的作用，因此取決於其資本主義的發展水準。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標準。

對於托洛茨基，稍遜一籌的重要問題是，是否在該國存在著一支宏大熾熱的“大眾化”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會吸引大多數國民並且要求最大膽的革命措施。在這個問題單中，他強調了民族問題。

鑒於帝國主義列強施加的不能忍受的民族

壓迫，按托洛茨基的觀點，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礎上，年輕和較小的無產階級可能掌權，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上，主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高度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掌權，在時間上，前者可以先於後者。如果無產階級沒有取得一個受壓迫民族的領導權並奪取政權，就沒有民族民主革命，甚至像拉紮羅·卡登那斯那樣激進和特殊的領導人帶領的，像墨西哥革命那樣大的革命，都不能履行其解放民族脫離帝國主義統治的任務。

當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拒絕拉丁美洲統一的想法，把它歸於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PRA）的改革派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時候，托洛茨基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提出問題。在評論美洲人民革命聯盟主要領導人的立場時，他寫道：“哈亞·德·拉·托瑞堅持拉丁美洲國家聯盟的必要性，他信的結尾是這個用語：‘我們，南美合眾省的代表’。就其本身來說，該思想是完全正確的。為拉美合眾國的鬥爭同每個拉美國家的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是分不開。不過，什麼道路可導致這個統一？是必須要清楚明確回應的問題。哈亞·德·拉·托瑞的一些極為模糊的提法可導致一個結論，即他希望說服目前拉丁美洲的各國政府在...美國的監護下...自願統一。在現實中，只能通過反對帝國主義，包括反對“民主”帝國主義和其內部代理人的群眾革命運動，達成這一目標。我們承認，這是一條艱巨的道路，但沒有其他辦法。”[7]

立基於農村生活的半奴隸條件的拉丁美洲資本主義，具有陳舊而已經腐朽的特點，在指出這種情況時，托洛茨基解釋說：“美洲資產階級在其歷史性的興起時，在北部半個大陸，它已經能夠統一在一個單一的聯邦內，現在它利用從統一獲得的全部力量把南半部分化，削弱，退化到奴隸制。中美洲和南美洲只有把他們的國家統一成一個強大的聯邦，才能使他們自己根本離開落後和奴隸制。

但不是落後的南美資產階級----外國帝國主

義的腐敗機構，而是年輕的南美無產階級----被壓迫群眾所選擇的領導者，將被召來解決這個問題。因而，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暴力和陰謀，以及反對土著買辦集團的血淋淋統治的鬥爭中，口號是‘中南美洲蘇維埃合眾國’。”[8]

採取了這一論斷後，由托洛茨基在1940年5月草擬的，關於帝國主義戰爭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第四國際宣言，繼續說道：“只有在其本身的革命領導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才能與大都市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整個實現無敵的合作。

“惟有這項合作可以推翻整個世界的帝國主義，從而把被壓迫人民帶向完全確定的解放。國際無產階級勝利，將把殖民地國家從漫長而痛苦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釋放出來，向他們打開與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攜手到達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永久革命的觀點並不意味著在任何情況下，落後國家應等待先進國家的信號，或者說，殖民地的人民應耐心等待大都市的無產階級解放他們。上帝幫助自助者。所有國家，不管是殖民地還是帝國主義國家，只要那裡存在條件，有利於為其他國家的工人樹立一個榜樣，工人們就應在那兒發展革命鬥爭。只有主動和活動，決心和勇氣，才能真正實現口號‘工人即團結！’”[9]

在拉丁美洲，古巴革命第一次把國家從帝國主義枷鎖中解放出來，並進行了歷史上未完成的其他民主任務。它能夠這樣做，根本原因是：因為同1917年俄國革命裡所發生的方式類似，它給一個堅固的革命力量帶來權力，這個革命力量把自己等同於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直接和歷史的利益，並以一個永久和不間斷的方式，把民族民主革命任務的成果轉向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成果。

拉丁美洲和世界左翼力量的絕對多數都持守所謂的革命階段論，自從斯大林在蘇聯掌權以來，它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根本原則，任何熟悉革命階段論的人，都知道古巴革命所帶來的

是一個多麼巨大的破裂。階段論應用的結果一直是相同的，在它被應用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總是降級為不可能的事，即使是第一階段的任務也沒有完成過。他們不能得到實現，因為確保民族民主革命征服的唯一可能的路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本質。胡利奧·安東尼奧·梅拉是這樣總結的：“具體地說，只能由無產階級通過工人革命的手段贏得絕對的民族解放”。[10]

被強大的拉丁美洲這樣一個使命所觸動，古巴革命把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最革命潮流的綱領性訴求同社會主義革命聚集一起。馬蒂去世後第一次並且受激於他的榜樣，在20世紀60年代這場革命闡述設計了大陸革命的戰略，它在拉丁美洲的大膽實施，是由國際遊擊部隊首腦切·格瓦拉司令執行的。我們今天知道，在切的戰略計畫裡，他的指揮下的民族解放軍，要在單一戰略的基礎上團結所有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並且有一天被整合到國際無產階級軍隊裡。這個軍隊的形成訊息，是在他的‘給三洲的信’中宣佈的。在參加了剛果革命和目睹了它的失敗之後，切寫道：“國際無產階級軍隊的倡議在第一次挫折面前應該不會死亡。”[11]

當切·格瓦拉和他的古巴、玻利維亞和秘魯的同志在玻利維亞鬥爭時，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發生在哈瓦那。來自拉丁美洲所有國家的絕大部份革命流派和左派組織相會於拉美團結組織會議(OLAS)。“這裡代表的組織”古巴代表團主席阿曼·赫德說：“開會擬訂一項共同的鬥爭戰略反對揚基帝國主義和偏從美國政府利益的資產階級寡頭和地主。古巴代表團代表一個革命黨。我們的論點依據的是馬克思列寧的意識形態。我們是這個大陸人民的團結這個優良革命傳統的繼承者。我們應忠實於這一傳統。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說，該人民革命的目的，在於破壞國家的軍事官僚機器並代之以武裝的人民。列寧後來說，這

一思想裡有馬克思關於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任務的基本教訓。我國代表團認為，歷史經驗已經證實了馬克思列寧的這些結論。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理論與其實際後果這兩方面分析馬克思列寧的這些方法。”[12]

在其對大陸革命戰略的報告中，古巴代表團回顧說，“馬蒂觀念的價值和深刻性可以衡量如下：[馬蒂]加深了拉丁美洲作為單獨一個偉大國家的玻利瓦爾省理念，提出古巴的獨立鬥爭是拉丁美洲革命的一部分”。在同一時間內，古巴代表團表示，“今天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團結，比作為其基礎的背景有更大的深度，因為單一的拉美人民的大陸這個觀念已得到加強。”[13]

一年後，英迪·佩雷多，玻利維亞遊擊隊的倖存者，加強了他對於“在拉丁美洲建立社會主義的革命力量的勝利”的信念和他對於“玻利瓦爾省和切·格瓦拉關於政治和經濟上團結的拉丁美洲的夢想”的忠實，說：“我們的單一和最終目標是解放拉丁美洲，這不僅是我們大陸，而且我們的國家，目前分為20個共和國。”[14]

近40年後，迫切需要我們重申“一個單一的拉美人民的大陸概念”以及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為之鬥爭的理念，即“拉丁美洲將是一個單一的國家”，也要迫切把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統一納入人民運動和革命運動的綱領計畫。我相信，不要再拖延，我們必須開始為一個大陸革命戰略的精心設計準備條件，再一次，未來可能會證明大陸革命比它看起來的更加臨近。一套策略，將對應於拉丁美洲和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條件和美帝國主義主導的單極世界，美帝比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具侵略性和致命的危險，但同時，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腐朽糜爛，還有爆炸性的和不可調和的矛盾。

只有無產階級及其廣泛的盟友可以贏得獨立戰爭未贏得的東西，以及拉丁美洲資本主義不可挽回的損失，實現受剝削受壓迫群眾偉大鬥爭

的目標，不可避免地走向拉丁美洲作為一個單一國家的統一。今天，大陸統一是在一個更廣大平靜的架構下提出的，應該能夠吸引加勒比地區的不同民族。

在已經引述的，1967年OLAS會議上古巴代表團的報告中，我們看到有“一個明顯的事實，對於其各個方面，一直沒有評估：從未有過如此眾多的一群人民，這麼龐大的人口和如此延展的領土，卻保有非常相似的文化和利益，相同的反帝國主義的目標。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我們的美洲’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學習歷史傳統，因此，我們繼承了我們的祖先，因此，我們學習我們的前輩！對於拉丁美洲革命組織的代表們，這些都不是新的思想。

但我們是否充分的評估了這些事實代表什麼嗎？十九世紀最初幾年的遙遠時代，我們有一個大陸的鬥爭理念，它已發展到整個拉丁美洲，我們是否深入分析了該事實的意義？拉丁美洲由一個單一的偉大民族構成，我們是否足夠清楚地分析了這個不爭的事實？”[15] 所有這些問題，一如既往，也同今天有關。

要成為一個單一國家，拉丁美洲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要成為社會主義的，拉丁美洲應該是單獨一個國家。為讓拉丁美洲實現其第二次，真正的和明確的獨立，這是100多年前由馬蒂，40多年前由卡斯楚宣佈的，拉丁美洲的革命再次上路，直到建立一個單一的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家。它似乎是已經再次與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革命一起踏上征程。

【茲比格涅夫·馬欣·考瓦勒斯基是波蘭評論“rewolucja”（“革命”）的編輯，專門討論世界革命運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羅茲地區（1981年）團結工會的前領導人，和第四屆國際成員。我們在這裡發表的他的報告，以色裡亞·哈特的作者姓名，發表在2004年9月10日在哈瓦那舉行的關於

“我們需要烏托邦”的會議上。

茲比格涅夫·考瓦勒斯基在1980年至1981年是羅茲地區團結工會的領導成員。作為第一屆團結工會大會的一個代表，他參加擬訂的方案獲得採用。1981年12月宣佈戒嚴令時，他受法國工會主義者的邀請訪問巴黎。他說明編輯波蘭語言國外通訊，1981年到1990年第四國際在波蘭發行的雜誌，並出版了“Rendez-nous nos usines!”（“把我們的工廠還給我們！”）（La Brèche，巴黎1985年）。他目前是工會週刊Nowy Tygodnik Popularny和理論期刊Rewolucja的編輯。】

註釋

[1] 里昂·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3卷，第39章，www.marxists.org

[2] R. 紮瓦勒塔·梅爾卡多，“玻利維亞人民”，Siglo Veintiuno 出版社，墨西哥，1986年，第84-95頁。

[3] 奧古斯丁·開福，“拉丁美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解釋”，Siglo Veintiuno 出版社，墨西哥，頁49-59。

[4] A. 開福，同上，頁59-60。

[5] 佩德羅·巴勃羅·羅德里格斯，“何塞·馬蒂的民族解放思想”，思想批判。49，1971，頁144，156。

[6] 胡利奧·安東尼奧·梅拉，“文獻和論文”，社會科學出版社，哈瓦那，1975年，第190頁。

[7] L. 托洛茨基，“工程”，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85年，卷.19，頁160-161。

[8] L. 托洛茨基，“工程”，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79年，卷.4，頁56-57

[9] L. 托洛茨基，“工程”，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87年，卷.24，頁55-56

[10] L. 托洛茨基，“工程”，里昂·托洛茨基研究所，巴黎，1987年，卷.24，頁55-56

[11] 埃內·切·格瓦拉，“革命戰爭通道：剛果”，Sudamericana社論，布宜諾賽勒斯，1999年，第32頁。

[12] “‘海浪’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古巴代表團的報告”，哈瓦那，1967年，頁5-6。

[13] 同上，頁30，38-39。

[14] 圭多·“Inti”·佩雷多，“玻利維亞遊擊隊沒有消亡！他才剛剛開始”，三洲-特別副刊，1968年，頁6。

[15] “古巴代表團報告”。同上，第26頁。

反抗的提綱

丹尼爾·本薩德

以下是丹尼爾·本薩德為《南風》雜誌寫的文章，尋究馬克思主義今天所面臨的理論挑戰，代表了大膽的嘗試。根據作者的看法，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和其他主要政治流派的理論貧乏可能會導致馬克思主義者固步自封，一味執守著過去的正統性。不過，他堅稱，斯大林主義崩潰後，世界變化巨大，革命理論現在必須嘗試來把握這種變化。他討論的範圍涵蓋現代帝國主義，蘇聯一類國家的得失總結，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新民族主義和社團認同，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和政黨和後現代主義的觀念等等，不一而足。這是一篇難懂的文章。我們翻譯成英語供參考，因為該文章對現代馬克思主義的弱點和挑戰有重要的見解，乃未來研究與思考的重要標誌；所以儘管難懂，但將吸引和激勵許多我們的讀者。

“我們正面臨著雙重的責任：傳播受到守舊主義威脅的傳統，並探索不明朗的未來輪廓”。

在最近十年的過程中（自蘇聯解體和德國統一後），有某樣東西結束了。是什麼？是厄里克·霍布斯鮑姆和其他歷史學家所談論的，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柏林牆倒塌的“短20世紀”嗎？

抑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短時期呢？該時期以冷戰的兩個超級大國為標誌，特點是各帝國主義中心持續的資本積累和“福特主義”調節。

要不然，或者是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歷史大週期？這個週期開幕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發展，隨之而來的殖民擴張和現代勞工運動的興起，以第二國際的形成為象徵。

關於工人運動的偉大戰略分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草創時期：例

如，帝國主義分析（希爾弗丁，鮑威爾，羅莎·盧森堡，列寧，巴烏斯，托洛茨基，布哈林）；民族問題（羅莎·盧森堡，列寧，鮑威爾，貝爾·波若廓夫，潘涅庫克，斯特拉瑟）；政黨-工會關係和議會制（羅莎·盧森堡，索列爾，饒勒斯，尼烏文赫伊斯，列寧）；戰略和權力之路（伯恩斯坦，考茨基，羅莎·盧森堡，列寧，托洛茨基）。

這些爭論在我們歷史上的份量，不下於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開啟的革命和反革命的衝突作用。

當時的工人運動往往超越激烈的方向及方案的分歧，展現了相對的團結並且共用一種文化。這方面如今還剩下什麼？

在重新發行的“新左派評論”第一期上，有一篇非常含糊的社論，在該文中佩里·安德森估計，自改革運動以來，世界並不缺乏統治次序的替代選擇。查理斯·安德列·烏德利更明確，認為目前情況的一大特色是獨立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消失”。

於是，我們處在一個不定的過渡階段的中間，此時舊東西正在死亡但沒有消除，新事物正在努力顯現，我們夾纏在未超越的過去和日益迫切的開展獨立研究課題的必要性之間，這研究課題將使我們能夠在眼前敞開的新世界中定位自己。因為舊工人運動傳統的衰弱，鑒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平庸和我們其他的右派對手的存在，有這樣的危險：我們可能會退而只是維護舊的理論成果，而這些成果今天的價值有限。當然，理論的生命依賴於辯論和對抗：我們總是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我們的辯論對手。但這種依賴性是相對的。

說來容易，在法國稱之為“左派們”的大政治勢力，如社會主義黨，共產黨，綠黨，在根本問題的解決辦法方面，他們並無新意。但是，必須記住，儘管他們幼稚，有時過於年輕，20世紀70年代的

極左派辯論卻比今天的他們更有成果和豐富得多。

因此，我們已開始了時代相遷的危險過渡，而且我們處在中流。在大膽地分析這些新時代的同時，即使受到守舊主義的威脅，我們也必須同時傳播和保衛我們的理論傳統。即便會讓人震驚，我也願以我形容為“開放教條主義”的精神面對這個試驗。“教條主義”這個詞或許有壞的名聲（據媒體的共識，開放的比封閉的，輕便的比沉重的，靈活的比硬性的總是更好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在一切理論的事情上，對流行想法的抵制有其作用。對多種多樣的時興觀念和流行的影響提出挑戰，需要在既定模式改變以前，先對其作出有力的反駁。之所以要“開放”，因為我們不應該宗教性地維護教條說法，而是應對照新的現實作測試，從而豐富和改造世界觀。

我會提出五條反抗的提綱；其方式是要刻意地強調必要的拒絕工作。

1. 帝國主義還沒有消解於商品全球化中。
2. 共產主義並沒有消解於斯大林主義的倒臺中。
3. 階級鬥爭不能淪為社區認同政治學。
4. 衝突的差異不融合於矛盾的多樣性。
5. 政治學不能解體為倫理學或美學。

我認為這些提綱是可論證的命題。其注釋則解說推理的結果。

提綱1：帝國主義還沒有消解於商品全球化中

帝國主義是統治的政治形式，對應於資本主義積累中的聯合與不平等發展。現代帝國主義已改變其外觀。帝國主義並沒有消失。在最近數百年的過程中，經歷了三大階段：a) 殖民征服和領土佔據（英國和法國殖民帝國）；b) 金融資本或“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統治，希爾弗丁和列寧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工業和銀行資本的

融合，資本出口，原材料進口）；c) 在二戰以後，一些帝國主義列強分享世界的統治權，前殖民地的正式獨立和受控發展。[1]

由俄國革命開啟的進程系列已告一段落。我們走向的是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新階段，類似於出現在1914年以前的金融統治。現在，帝國主義霸權推行的方式多種多樣：金融和貨幣的控制（允許控制信貸機制），科學和技術的控制（對專利的壟斷），控制自然資源（能源供應，控制貿易路線，給生物組織加以專利控制），行使文化霸權（由大眾傳媒的巨大力量強勢推行），還有最後的情形，行使軍事優勢（很明顯地見於巴爾幹地區和兩個海灣戰爭）。[2]

在這種全球化的帝國主義新結構裏，對領土的直接控制次於對市場的控制。結果導致一個非常不平等和非常糟糕的聯合發展，該發展結合了新的主權關係（如債務、能源、食品 and 健康的依賴性，軍事協定的分支機制），和新的國際分工。

直到二、三十年前，還似乎走在經濟發展道路上的國家，再次盤旋在不發展狀況中。

例如，阿根廷再次成了主要原材料出口國（大豆已成為其主要出口產品）。20世紀50年代納賽爾阿拉伯民族主義統治的埃及，吹噓其收回主權（以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為象徵），在掃盲教育上的成功（為中東國家提供工程師和醫生）和工業化的開始（如同布邁丁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今天只不過是旅遊業者的天堂。兩個債務危機（1982年和1994年）和融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後，墨西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像受控制的“北方巨人”後院。

依賴和統治關係的蛻變特別反映在戰爭的地緣策略和技術改造上。

二戰期間，不再可能談論單個戰爭，談論單獨一系列的戰線，而是幾場相互重疊的戰爭。[3] 冷戰結束以來，衝突的性質防止任何非黑即白地看待

雙方的方式。所有最近的衝突，連帶其獨特的組合和多重矛盾，都顯示不可能有簡單的回應。

在福克蘭群島戰爭時，反對撒切爾英國的帝國遠征的立場決不能迫使阿根廷革命家支持軍事獨裁者。在伊朗和伊拉克的衝突裡，面對兩種形式的專制，出現在這兩個國家的革命失敗論是有道理的。在海灣戰爭中，國際反對“沙漠風暴”行動的立場，並不意味著對薩達姆·侯賽因專制政權的任何支持。

全球化也在衝突的結構方式上產生後果。我們已不再處在爭取解放的戰爭時代，那時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對立情形相對簡單。這個全球化後果，使得利益和快速變來變去的立場糾纏不已。顯然，這就是所以要總結收支平衡明細表的原因，因為要從懷疑，錯誤（有時）和我們可以在近年的衝突裏找到的困難中得到教訓。

把衝突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對立，導致偏重“人權帝國主義”的聲音，而這個聲音給了北約干預前南斯拉夫的理由。

提綱1.1：國際法和國家民主主權不可能消散於人道主義倫理中

民族國家的功能在19世紀就已形成了，毋庸置疑，儘管在改變和削弱，國與國之間的國際法時代卻沒有來到。矛盾的是，在過去10年歐洲已經看到10多個新的正式主權國家，有超過1.5萬公里的新邊界出現。為波斯尼亞、科索沃或車臣自決權的辯護顯然是主權的辯護。這個矛盾被“主權主義”的貶義概念弄得模糊，在這個概念下，令人噁心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混淆於政治主權的合法民主訴求，該政治主權阻礙單純的人與人的競爭。

仍需籲請國際法清楚地闡明兩個合法性準則：迫在眉睫的人類和公民的普遍權利準則（其中的某些機構，如國際刑事法院，成了部分具體化的機構）；以及國家間的關係準則（其原理可追溯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說法），在這個準則的基礎上，

如聯合國那樣的機構得以建立。無須把聯合國沒有的用處歸於聯合國（別忘了在波斯尼亞、索馬里和盧旺達的表現，那是一張災難明細總結表），有必要指出，參加‘盟軍行動’的國家所追求的目標是修改新帝國的秩序結構，讓其有利於新的強權，比如說北約（在50周年的華盛頓峰會期間，其作用被重新界定和擴展了）和世界貿易組織。

從二戰結束後出現的力量關係中產生了聯合國，毫無疑問，聯合國必須改革和民主化（反議會制並不妨礙我們支持像比例與性別一類審議模式的民主改革），從而有利於聯合國大會，反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種封閉俱樂部。不是為了賦予其國際立法的正當性，而是要確保，肯定不完善的“國際社會”代表，反映了利益和觀點的多元化。同樣，圍繞著歐洲政治體制，以及像海牙法庭，緊急刑事法庭和未來的國際刑事法院一樣的國際司法機構，我們迫切需要做出省察思考。

注解說明1：要更新帝國主義的概念，不能只從經濟統治關係（明顯的）的觀點出發，全球的統治系統（科技的、生態的、軍事的、地緣戰略的、體制的）擁有資本的重要性，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刻，恰恰是當看似聰明的人認為，隨著其東方官僚對手的崩潰，這一概念範疇已經過時的時候，發生在世界圍繞著無條件（西方給予另一種方式）的民主和野蠻之間的簡單對立而組織起來的時候。

瑪麗·卡爾多，八十年代初同EP·湯普森一起，是反“毀滅主義”以及反對在歐洲部署潘興和巡航導彈的核裁軍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現在卻說，“內部和平與外國戰爭之間的威斯特伐利亞時代特徵，造成了國內的法制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與冷戰一起結束。”，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順利邁向全球性法制”的時代。這正是有些人稱之為沒有衝突恐懼的“道德帝國主義”，瑪麗·卡爾多所謂的“良性帝國主義”。

提綱2：共產主義並沒有消解於斯大林主義的倒臺中

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意識形態，在試圖把帝國主義融入商品全球化的忠實競爭裏的同時，試圖把共產主義納入斯大林主義。於是官僚專制是革命歷程的簡單而合乎邏輯的發展，而斯大林則是列寧或馬克思的合法繼承者。出於這一概念譜系，這種觀點流行於世界各地。斯大林主義的歷史發展和黑暗災難，已經潛在地存於“無產階級專政”或“先鋒黨”的概念中。

當然，在現實中，社會理論從來沒有超過對一個時代所作的關鍵解釋。如果我們找出使其在面對證據和歷史時失去力量的差距和弱點，不能根據另一時代的標準評判該理論。照此道理，繼承法國大革命的民主矛盾，人民和黨以及國家的迷惑，社會法令和政治法令的融合，閉眼不見官僚危險（低估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這一切有利於20世紀30年代的俄羅斯官僚主義反革命。

在俄羅斯熱月政變過程中有連續性和中斷性的要素。要準確地追溯官僚反動勢力的勝利時間，其困難牽涉到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不對稱性。反革命其實並不是革命的反面事實或反置的形象，並非是一種反轉的革命。就像約瑟夫·德·梅斯特爾談到法國的熱月大革命時，正確指出的那樣，反革命不是一場相反意義上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對立面。這取決於自身的時間尺度，即破裂的積累和互補。

如果說托洛茨基把熱月反動的開始時間追溯到列寧死亡時，那麼他則認為，直到20世紀30年代開始，伴隨著納粹主義在德國的勝利，莫斯科審判，大清洗和可怕的1937年，反革命運動並未完結。在題為“極權主義起源”分析文章中，漢娜·阿倫特建立了明晰的編年表，把官僚極權主義到來的日期恰當地定為1933或1934。從俄羅斯，前蘇聯，再到俄羅斯，莫舍·列文，揭露了20世紀20年

代末期以來的國家官僚機構的數量爆炸。20世紀30年代，鎮壓民眾運動的規模改變了。那不是契卡（政治警察）或政治監獄的實踐所預示的東西的簡單延伸，而是一個質的飛躍，國家的官僚體制摧毀和吞噬了黨，而黨一度被相信能控制住該官僚體制。

從三個角度來看，這種官僚反革命所表現的中斷性是重要的。與過去有關的：歷史的可理解性，歷史不是瘋人胡說的故事，而是社會現象，不確定結果和決定性事件的利益衝突的結果。與目前有關的：斯大林反革命的後果污染了整個時代和長期扭曲了國際勞工運動。對斯大林主義沒有歷史的認識，現在許多的悖論和僵局（開始於巴爾幹地區的週期性危機）是無法理解的。

最後，與未來有關的：這些反革命的後果，其官僚危險在意想不到的層面出現，仍然會在相當長的時間是新一代的重負。正如厄里克·霍布斯鮑姆寫道，“離開俄國革命及其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一個人就無法理解短縮的20世紀的歷史”。

提綱2.1：社會主義民主不能歸於民主國家主義

把斯大林主義反革命，描繪成“列寧主義”（里諾維耶夫在第5次共產主義國際代表大會上打造的概念，其用意是在列寧去世後，把關於國家的新的正統理由合法化）的原罪不僅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對於未來也是危險的。因此要充分地理解並糾正這些錯誤，以防止“權力的職業危險”，並保證透明的社會。

如果放棄了對富裕的幻覺，那麼這個災難性的經驗是必要的教訓，這個經驗就是排除社會的選擇和仲裁（如果必然性是歷史的，那末富裕的觀念是強烈相對的）；如果我們放棄絕對的民主透明性的假設，該民主透明性建立在人（或解放了的無產階級）的均一性和國家迅速消亡的基礎上；最後，如果我們移除所有“時間尺度不一致”的後果（經濟、生態及法律的選擇，習俗、心態、藝

術有不同的時間性;性別和代溝矛盾的解決方法和節奏不同於階級矛盾)，那麼我們應該得出結論：作為分開的領域，國家和法律在削弱，這樣的假設，並不意味著註定會消亡，除非結果是社會的國家化，而不是權力的社會化。

因此，官僚主義不是虛假觀念的討厭後果，而是社會現象。在俄羅斯或中國肯定有特別的原始積累形式，但其根源在匱乏和分工。官僚主義以多種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普遍方式表現自己。

這可怕的歷史教訓，必須導致綱領性結果的深化，這些結果起於1979年第四國際制定的檔“社會主義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該文專門論述了作為原則的政治多元化，社會運動相對於國家和黨派，法律文化和權力分立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用19世紀的政治詞彙來說，誘發了法律制度：賦予羅馬議院反對暴政的臨時緊急權力，然後，這制度成了專制政權的名字。[4]不過，這個概念因為有原始的含糊性，同太多仍在經歷的慘痛歷史經驗相關，負重難行。然而這個解釋並沒有給我們機會，重新構劃多數民主的問題，重新構劃社會和政治間的關係，以及削弱統治的條件。對於該統治，巴黎公社“最後發現”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似乎給出了答案。

注解說明2.1：斯大林主義代表的是官僚反革命，而不是10月革命興起的制度的簡單的，或多或少不可逆轉的演變，該觀點遠遠不符合一般的共識。正好相反：自由改革派和斯大林主義懺悔者同意，把斯大林主義的反動視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邏輯延伸。實際上，這正是正統共產主義傳統的“革新者”所達到的結論，他們堅持認為斯大林主義主要是一個“理論的偏差”，而不是可怕的社會反動。

在“答覆呂偉思”一文中，路易·阿爾都塞把斯大林主義特徵化為“經濟偏差”。許多其他的理論家則把重點放在理論上的錯誤或偏差上。這表明足以糾正這錯誤以避免官僚主義危險。[5]“理論偏差”的方法，使得對官僚反革命的政治分析中的插入

語總是存在，致力於尋找理論原罪，不僅導致了對“列寧主義”週期性的清盤，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對革命馬克思主義或啟蒙運動遺產的清盤：從指責列寧，我們迅速過渡到指責馬克思...或盧梭！就像馬特里指出的，如果斯大林主義主要是“無知”的結果，那麼更大的理論洞察力，將足以防止權力的職業危險。[6]這是件極其簡單的事。

注解說明2.2：法國出版的厄里克·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受到左派歡迎，這是個展示了健康思維的作品，立論方式借助於傅雷式歷史學和斯特凡·古爾多瓦風格的歷史裁判法。這一方式的借用雖然合情合理，仍然冒有讓作品的極端疑問面含糊不清的風險。

霍布斯鮑姆當然不否認熱月挖墓者的責任：但他削弱之，仿佛業已發生的，按照歷史的客觀規律，是不得不發生的。對可能的不同結果，他幾乎不屑一顧。

因此，霍布斯鮑姆到達他認為的這個奇怪世紀的悖論：“十月革命最持久的結果，是拯救其戰爭對手一如拯救其和平對手，鼓動自我改革。[7]似乎革命是自然發展，而不是可怕的社會政治衝突的結果，在這些衝突中，斯大林反革命並非最可怕的！這個歷史的“宿命主義”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是：1920年，“回顧起來，布爾什維克犯了錯誤，這個錯誤似乎是主要的：即分裂國際勞工運動”[於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之間-編注]。[8]

在採納和應用共產國際21個加入條件的情況下，如果這些情況要求批判性的檢查，我們還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國際勞工運動的分割不是意識形態願望的結果，也不是教條錯誤的結果，而是革命原始衝擊的結果，是其辯護者（主要者如羅莎·盧森堡）和反對者及其帝國主義神聖同盟之間的分水嶺。

對於霍布斯鮑姆，如果內部戰鬥時期意味著一場“國際規模的意識形態內戰”，那麼他不是談論基本階級，資本和社會革命，而談論的是：進步與反動，反法西斯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因此，他談的是重新組合“一個超級的力量譜”。在這個角度來看，並沒有多少餘地可供作一個重要的結算表，用來評估德國革命，1926/27年的中國革命，西班牙內戰和人民陣線。

避免作任何斯大林反革命的社會分析，霍布斯鮑姆滿意地說，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當戰鬥塵埃落定時，沙皇舊正統帝國在本質上死灰復燃，完整無損，不過是在布爾什維克的權威下。”對他來說，正相反，只是在1956年，隨著匈牙利革命的粉碎，“社會革命的傳統消耗殆盡”和“忠於其的國際運動解體”構成了“全球革命的滅絕”，就像一場單獨熄滅的革命。簡言之，“首要的是，就組織結構而言，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改變了世界”。用此令人沮喪斷言，避開了一個對官僚主義的嚴重批判；社會財產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的“不便”，只是被視為暫時性的，似乎這個財產真是社會的，似乎官僚主義是一個微小可悲的浪費而不是一個反革命的政治危險！

霍布斯鮑姆的作品，其“歷史學家的歷史”角度多於批判或戰略的歷史觀點，而後者能夠發現歷史大轉捩點時的可選方案。

在“活著的托洛茨基”中，皮埃爾·納維勒極力強調這一方法論觀點的所及範圍：“既成事實的捍衛者，無論他們是誰，其視野比政治行動者短得多。積極和戰鬥的馬克思主義是先成地傾向於視覺觀點，該觀點常常同歷史觀相反”。

納維勒說，托洛茨基所謂的“預測”，比預言或預示更能同先知的預期相比。當革命運動扯起風帆時，歷史學家發現該事件的意義是自然的，同樣的歷史學家，在事情是複雜的而且有必要知道如何逆流而游時，他們尋找其不利條件。要他們設想“按錯誤方向概述歷史”（照沃爾特·本雅明的公式）的政治責任，是很困難的。納維勒說，這讓

歷史有可能展開其追溯的智慧，能夠對事實，遺漏，和錯誤作編列。但可悲的是，這些歷史學家有意回避指示正確的路線，該路線本應讓溫和派領導革命的勝利，或者相反，指出熱月時期的合理而勝利的革命政策。

注解說明2.3：做點我們的運動忽略了的事，應當是有益的：即對一般的極權主義概念（及其同現代帝國主義時代的關係），以及特殊的官僚極權主義，做更深入的討論。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斯大林》裏經常使用這個詞，而並沒有給予精確的理論地位。在同時探討某些當代傾向（民眾中階級的粉碎，政治的種族認同和惡化趨勢）和官僚極權主義之下可能採取的特定形式時，這個概念被認為非常有用，漢娜·阿倫特在她的極權主義起源論述三部曲中分析了那些傾向。這也使得這個有用的概念被過度濫用，使它服從於意識形態，把極端民主（沒有限制或條件的，因此，資產階級實際存在）和極權主義兩者的極端對立，當作唯一關乎我們時代的事而合理化。

注解說明2.4：堅持官僚反革命的概念，並不意味著以任何方式關閉對上個世紀的革命總結作更詳細的辯論。與此相反，由於做了較好的關鍵性重構，我們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再次借用。[9]嘗試不同的理論闡釋（國家資本主義理論，馬遜克到托尼·克利夫；新剝削階級，列茲到伯納姆或卡斯托里亞迪；或墮落的工人國家，托洛茨基到曼德爾），從實踐的角度看，可以有重要的後果，而且通過一些校正，同對斯大林反革命所作的診斷是相符的。

如果凱薩琳·薩瑪莉現在提出這樣的思想，即同權勢話語鬥爭，要求有新的社會革命而不只是政治革命，那是因為這不是簡單的用語修改的問題。根據被曼德爾豐富了的托洛茨基提綱，過渡社會的主要矛盾，存在於計劃經濟的社會化形式和官僚寄生及特權產生分佈的資產階級範式之間。於是，“政治革命”的內容是引入政治上層建築，讓其符合既定的社會基礎。安東莞·阿投斯說，這個

觀點忘掉了人，即“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不只是那些最好不要形容為“後”的社會，似乎他們是按順序在資本主義之後來到的，事實上，他們是由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積累的矛盾決定的），國家在構建生產關係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這個觀點，除了常見的工資形式之外，官僚系統，國家社會集團，可同直接生產者一起處在剝削關係內”。

繼續這場辯論應當注意理論的混亂。用直接的社會學術語解說政治現象的特徵，損害該領域和政治範疇的特殊性，都與該混亂有關。許多含糊之處，都要歸因於“工人國家”這個範疇的出現。“工人黨”這個概念可能也是如此的，往往把政治力量的功能同對抗和聯盟的遊戲，深刻的社會“性質”聯繫起來。

提綱3：階級鬥爭不能淪為社區認同政治學

在太長的一段時間裏，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給無產階級使命，根據該使命，其覺悟最終會符合其精神實質，從而成為全人類的救贖者。對許多人來說，翌日的失望，同前一天的幻想成正比：不必脫胎換骨成為“一切”，這個無產階級後來減少到無。

首先，我們要記住，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概念與大學社會學並沒有多少關係。如果在實踐中，沒有關於該問題的統計方法，這主要並不是因為該學科後來還在萌芽狀態（第一屆統計資料國際大會是1854年舉行的），而是因為一個更根本的理論原因：勞資間的剝削關係控制著資本主義積累，階級鬥爭是勞資間剝削關係所生出的固有衝突，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結果。因此，在馬克思那裏，我們見不到任何關於階級的簡化，正規或分類的定義，而是見到動態的概念，在生產，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水準上，階級結構對立的動態概念：階級從未僅僅界定在生產過程（企業工人和雇主之間的對抗）的水準上，而是由整個再

生產確定，‘整個’的意思就是：工資鬥爭，勞動分工，同國家機器的關係，以及世界市場都進入賽場競爭。（因而很清楚，勞工的生產力特性，在《資本論》第2卷裏有特別的論述，同流過程有關，並沒有界定無產階級。在其核心方面，這些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得到處理和廣泛的討論，明確反對一些觀點，關於這些觀點，共產黨在其關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提綱中為之辯護，龐蘭絮斯，博多洛和俄斯塔布勒則從反面為之辯護。）

[10]

馬克思泛泛而談無產者。一般來說，在十九世紀，人們談論的是複數的勞工階級。工人階級的德語術語“*arbeiterklasse*”和英語術語“*working class*”有足夠的一般性，而現代法國的政治詞彙“*classe ouvriere*”（工人階級），含有容易模糊的限制性社會學內涵：涉及到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但不包括服務和商業的雇員，雖然，從這些雇員同生產資料私有權的關係，他們在勞工層的地位，或更進一步，他們的打工者狀態和他們收入報酬的角度來看，這些雇員經歷類似條件的剝削。

也許“無產階級”術語在理論上比“工作階層”更可取。在發達社會，確實代表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之間的職業人口。考慮到嚴格的工業無產階級，即使在最近20年的過程中遭受顯著的減少（佔職業人口的比例，從35 %降到26%左右），離消滅仍然遠得很，趣的問題不是關於其會消失的預測，而是社會變形及其政治代表。[11]

從國際視野看，無產階級的真實情況就顯示出來了。因此蜜雪兒·庫恩所說的“世界無產階級化”變得顯而易見。1900年的全球10億人口中，掙工資的工人約為5千萬，現在60億人中，他們佔20億左右。

因此，這是理論的、文化的、而且更是政治的秩序問題，而不是嚴格社會學的問題。階級觀念本身就是鬥爭和組織形成過程的結果（見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導言），在這個過程中，對鬥爭中產生的理論概念和自決權的覺悟得

以組建構成：對階級的歸屬感，是政治的形成過程的結果，就像社會學的確定的結果一樣。那麼這覺悟的削弱，是否意味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消失？用代表意識形態的後現代話語來說，這個弱化，是局勢上的（同鬥爭的起伏相關）還是結構上的（新統治程式的結果，該統治不僅是社會的，而且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是蜜雪兒·蘇里亞所謂的“絕對資本主義”）？換言之，如果階級鬥爭的成效，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廣泛的驗證，那麼後現代的支離破碎和個人主義，允許我們設計共有共用集體的重建嗎？在商品拜物教和消費主義氾濫普及的情況下，短暫而即時的瘋狂，可以超越沒有未來的激烈融合的時刻，再次表現為持久的政治和社會項目嗎？

於是，從工作組織的視野出發，依照積累制度，就像按照法律政治規則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一樣，極為首要的理論任務之一，不僅同工薪人員的社會學轉變有關，而且同現行工資關係的轉變有關。

在同撒切爾-列根年代的反改革的對抗中，如果癡迷在氾濫無度的商品叢林的形象裡，不對重新組織和重新調節的嘗試作衡量，那麼對超自由主義的批判，會有犯目標錯誤的風險。就像波爾坦斯基和夏佩羅注意到的，沒有合法性或理由（葛蘭西說，沒有霸權，就沒有持久的強迫），在赤裸裸的剝削和壓迫的形式下，對資金的支配不能持續。

注解說明3.1：然後，擺在議事日程上的，是根據目前的生產力（新技術），資本積累和社會再生產的一般條件，重新界定全球性的結構、領土組織、法律關係。在這個框架內，我們看到傳統政治勢力，基督教民主黨、英國保守黨、法國右派黨的改造危機，以及對他們在戰後民族國家框架內所完成的功能的質問；並且也是在這個框架內，社會民主黨發生轉型，精英通過公共部門的私有化，以及私人精英與國家精英的融合，正日益有機地與資產階級執政階層結合起來。

鑒於在復原中的傳統資產階級的弱點，社會民主黨們常常被召來承擔資本現代化的臨時責任，把沒有規劃的後斯大林主義黨派，和大部分的綠黨拖坎城入其軌道，綠黨缺乏理論的必要資源以抵制加速的制度化。

然後，無論是按照布雷爾-施羅德第三條道路的宣言方式---該專案旨在一個最低程度的社會主義歐洲，曾在里斯本歐洲首腦會議上辯論過---還是按照法國僱主協會關於“社會重建”這一主題的策略作概括論述，結果都不是無規則的自由主義，而是新的工資關係，該關係處在一個過去聞所未聞的自由-社團主義和自由-民粹主義形式的框架內。認為未來唯一可能的民粹主義形式，將是類似法國的帕斯誇和維利爾斯之流的保守主權主義，那將是危險的短視。

工薪股東的改革運動，私人養老基金（不利於凝聚力），以及通過凌駕於法律的客觀關係之上的個人合同（往往是個人從屬於強烈不平等社會的同義詞）的法律至高無上地位，使社會聯結（受到阿蘭·蘇皮奧特的譴責）“再封建化”；這一切，概述了新的資本-勞動組合關係，在那裏，一小圈獲利者的存在，損害大量的全球化受害者。在某些情況下，這一趨勢是完全相容於國家自由主義的驚厥形式，該國家自由主義是俄羅斯普京式的或奧地利右派民粹主義領導人居格·海德爾式的。

在另一方面，處理海德爾個案時，將其類比於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運動，而不是連系到當代的而且可能前所未有的右傾危險的形式，那是無效果的，也可能是欺騙。如果參與反海德爾（不過別忘了，他有一些針對貝盧斯科尼，菲尼，米隆，布朗等人的富裕詆毀者，這些人自得意滿）的動員是正確的，我們不應該忘記，海德爾首先也是保守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十三年聯盟的產物，歐盟的民主缺乏和緊縮政策使他到達這個位置。

重要的是，應當考慮今日世界上反動威脅能夠採取的奇特形式，歐洲重組中地方主義的作用，以及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聯姻。按他的方式，

海德爾不乏黑色幽默地說：“布雷爾和我反對保守主義勢力”。[12] 我們兩黨“要擺脫福利國家的僵化，而又不造成社會的不公”。大家都要“法律和秩序”。雙方認為，“市場經濟，按照使其靈活的條件，可以為工薪階層和公司創造新的機會。”然後，勞工黨以及自由黨有非教條式的辦法對應“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轉型”，其中“左右派的舊範疇已不適合”：“布雷爾和工黨右派會接受關於移民的申根協定和嚴格立法嗎？”海德爾問。他的回應是，“如果布雷爾不是極端主義者，那麼海德爾也不是”。

我們要補充一點，就是地方民粹主義者海德爾像布雷爾一樣支持北約，甚至比他對歐元的支持更強硬！

注解說明3.2：最近出現的未公開過的盧卡奇1926年的文章，捍衛“歷史與階級意識”，在某種程度上，該文使盧卡奇的超黑格爾的解釋失效，根據該解釋，黨是絕對精神最後發現的形式。[13] 在共產國際第5次代表大會上被儒達斯和德邦里攻擊為“主觀主義”，即齊諾維也夫布爾什維克化，盧卡奇拒絕儒達斯的說法，根據該說法，無產階級註定要按照其“存在”行動，而黨的任務退化為“預測發展”。對於盧卡奇，黨的特殊（政治）的作用起於一個事實，即階級意識的形成，不斷地同拜物教和物化的現象發生衝突。就像斯拉沃·齊澤克說的，在他的尾聲，黨發揮其在歷史（普遍的）和無產階級（特別的）之間的三段論仲介的作用，而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是歷史和科學（通過教育黨而具體化）之間的仲介，而在斯大林主義中，黨使用歷史感，把其對無產階級的統治合法化。

提綱4：衝突的差異不融合於矛盾的多樣性

把社會衝突簡化為階級衝突，作為對這種表述的反對，現在---根據後現代主義及類似的理論---是空間和衝突多元化的時刻。按照其特定的和不可

簡化的唯一性，每一個人是多個屬性的原始組合。大部分的後現代性說法，比如分析性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傾向，採取這個反教條主義的批判，其批判遠至階級關係消散在方法論個人主義的陰暗水域裡。不僅階級對立，而且更普遍的衝突分歧，從而稀釋在黑格爾所調的“沒有差異的多樣性”中：也即一些平庸無奇的特性的會聚中。

當然，被當作差異辯護的理由，常常涉及寬鬆而自由的容忍性，這個容忍性就是商品同一化的消費主義反面。同這些沒有個性的個人主義及差異的動作相反對，為一致性的辯護，趨於把種族或性別的差異凍結和自然化。不是關於差異的概念有問題（允許構造反對面），而是其生物上的天然化或其同一性的絕對化有問題。因此，當差異對普遍行為模式的構建作調解時，極端分散則放棄這個構建。阿蘭·巴迪歐說，當一個人放棄普遍行為模式時，盛行的是普遍恐怖。

這個差異性和普遍性的辯證關係，就如對平等性或同性戀運動的作用的討論，以及對其缺乏瞭解所表明的那樣，是我們常遇到的困難核心。兔兒（男同性戀者---譯注）運動宣佈取消性別的差異，以有利於非排他的性關係實踐，直至拒絕所有邏輯上簡化而持久的集體確認；與兔兒運動不同，雅克·邦克，在他的“別了，規範”，概述了面對壓迫及其在具體普遍性範圍內預期的弱化，既定差異構成力量關係的辯證法。

與此相反，兔兒（男同性戀者---譯注）發話宣佈，要立即消除差異。其關於欲望的辭令，缺乏社會必要性的理由，推進圓房完婚的強制願望。兔兒物件，得過且過，繼承無歷史的同一性，不再是同性戀鬥士，而是變化中的個人，不是特殊性別或特定種族者，而是其感受和欲望的簡單破鏡子。由於兔兒物件顯示的流動性同綿綿不斷的變換及時尚潮流完全合拍，這說法受到美國文化產業的熱烈歡迎，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同時，有逾矩違規的做法代表了對規範的挑戰，並宣稱贏得了

新的民主權利，這種做法，已經被庸俗化為隨心所欲的消費主義嬉戲時刻。

與此同時，某些勢力以“更具體，更專門和更肉體的”性欲範疇反對性別的社會範疇。他們聲稱要超越“性別的女性主義”，贊成“性欲多元化”。毫不奇怪，這樣運動意味著同時排斥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的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範疇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探討直接涉及到階級關係和社會分工的性別問題，但要瞭解“性的力量”，和發現不同於必需經濟學的欲望經濟學，則有必要發明獨立的理論（受感於“福科式”生物政治）。

同時，在同性戀者市場上，資本的新商品耐受性，導致觀念的衰減，該觀念就是對非生育之性傾向的生理敵視。在資本的道德秩序和同性戀之間，有不可稍減的敵對矛盾，這一觀念讓人相信，只要簡單地確認差異，社會秩序就會自動地被顛覆掉：同性戀者只要宣佈自己為這種反對者，就足夠了。然後，對同性戀歧視性統治所作的批判，可以在自我肯定之挑戰以及個體之無育自然化中結束。相反，如果異性戀和同性戀的特性屬於歷史和社會的範疇，那麼其與規範的衝突關係意味著差異和克服差異的辯證關係，是雅克·邦克所要求的。

這個問題，當其事涉性別或語言文化的溝通時顯然範圍廣闊，當其涉及到階級衝突的代表性時，也不是沒有後果的。烏爾裡希·貝克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悖論“無階級的資本主義”。呂西安·瑟維說，“如果在結構的一端確實有一個階級，那末令人吃驚的事實是在另一端卻沒有階級”。無產階級似乎已化解在一般性的平均化中了；我們現在不得不“作一場階級鬥爭，不是以一個階級的名義而是以人類的名義”。

要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這是一個平常的提醒：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爭取無產階級的解放，是全人類普遍解放鬥爭的具體仲介。或者，我們有戰略後果重大的理論創新，見於呂西安·瑟維這本書的其餘部分：在他眼中，社會撥款問題已

不再是基本重要的（因此，合乎邏輯的是，同普遍的疏遠化相比，剝削是次要的）；社會轉型退化為“非疏遠”的轉變，不是突然，而是永久循序漸進的轉變；國家的問題消失在權力的征服（吉爾斯·馬廷尼特以前一本書的標題）中，“一個霸權的逐步形成遲早會導致一個權力處在多數同意的條件下”，沒有決定性的對抗，由德國到葡萄牙，經過西班牙，智利和印尼，這個“多數同意”，至今從來沒有被證實！我們在羅傑·馬特爾身上發現同樣的口氣，對於他，“本質的事已不再是準備將權力由一組人手中移交到另一組人手中，而是開始給每一個人以可能性，讓他控制其生活的個人和社會條件”。個人自由的真正合法的反極權主義主題然後終結於孤獨的樂趣中，其中的社會解放淡化了。

如果在壓迫和統治的形式之間確實有互動，而不是一個特定形式（階級統治）對其他形式的直接機械作用，那麼還需要在給定時間和確定的社會關係內，更精確地確定這些互動作用的力量。我們是否只是在處理一連串的位置和衝突，因為其會導致聯合而可變的利益集團呢？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可以想像的統一將來自純粹的道德意志論。否則，資本和商品拜物教的普遍邏輯影響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直至為相對統一的鬥爭創造條件（不過，並不意味著同社會時代如此不協調，矛盾簡化為一個主導的矛盾）？

我們無意用偶像化的抽象整體反對後現代的躁動不安，但認定，非總體化（或解構過程）不可能從具體的總體化中分離出來的，這不是先驗的整體，而是整體的形成過程。這個過程中的總體化是通過經驗的轉換發生的，但瞭解到在商品全球化的邪惡形式之下，資本是一致化傾向的客觀經理者，如果不停留在該一致化傾向上，那麼從獨斷專行的意志（換言之，道德意志論）裏會興起鬥爭的主觀一致性。

提綱5：政治學不能解體為倫理學或美學

漢娜·阿倫特擔心政治最終會從世界完全消失，不只因為極權取消多元化，而且也因為商品的消失，這是它黑暗的一面。這擔心得到了以下事實的證實：即已經進入了一個非政治化的時代，此時，公共空間受到帶有經濟恐怖的暴力以及抽象道德主義的擠壓。政治和其屬性（計劃、意志、集體行動）的這種削弱，孕育了後現代囁語。超越這個轉折時期的影響，這種趨勢解釋了，在暫時空間壓縮的影響下，政治行動條件的危機。進步的現代異端意味著時間和轉化的文化，該轉化有損空間，將其簡化成附屬和暫時的角色。正如福柯指出的，空間變得等同於死亡，固定不動，反對活生生時間的豐富性和辯證活力。資本的殘酷輪換，及其再生產在全球的擴大，推翻了其評估條件。正是這一現象，二十幾年來，強烈地表達了瞬間長度的減少和空間位置的消失的感覺。如果政治的美學化是指向民主危機的一種內在經常性傾向，那末，讚賞地方性，尋找淵源，過度裝飾和賣弄誠實，這一切顯示的無疑是悲哀的眩暈，驗證著面臨不確定條件的政治虛弱。

按最切近的說法，政治被視為牧羊人或者紡織工的藝術，這意味著空間和時間的範圍，在該範圍內城市（連帶其公共場所和選舉任命的節奏）是形式。公民身份比城市重要得多，在範圍和節奏的一般紊亂中，公民變得無用。不過，我們仍然是生活“在一個這樣的階段，這時候有城市，而且政治問題的出現，是因為我們都屬於這個宇宙階段，在這個階段，世界由其運氣掌握”。政治仍然是時間和空間的褻瀆藝術，描畫且移動無神世界的可能線條的瀆神藝術。

提綱5.1：歷史不會消散於沒有明天的迷霧時間

後現代主義拒絕宏大敘述，並不意味著只有一個對進步幻想的合法批判，該進步伴隨著有理由的專制。這也意味著歷史的解構，意味著對即時短暫而且可廢棄者的狂熱崇拜，不再有中期項目的空間。結合誤調的社會時代，政治的暫時性正是

易變的時刻和不可企及的永恆之間的中期項目。現在更是要求時段和決策的變動範圍。

提綱5.2：地方和場所不消散於無限空間的可怕沉默中

資本（金錢和商品）的地域流動性，同勞動力的相對或非常有條件的流動性，兩者的不協調，顯現為目前的不平等發展形式，其允許在絕對帝國主義時代轉讓剩餘價值：暫時性的不平等發展補充和降低空間的不平等發展。因此，領土的活動範圍，控制流動所獲得的重要性，交織著軟弱附屬狀態的世界秩序的規劃，這些都屈從於商品主權。

不過，集體行動是按空間組織的：會議、大會、會戰和示威。其力量施加於地方，而事件的實際名稱同日期（10月，7月14日，7月26日）和地方（巴黎公社，彼得格勒，都靈，巴賽隆納，漢堡……）有關，正如亨利·列斐伏爾所強調的，唯有階級鬥爭有能力產生不可簡約成單一經濟邏輯的空間差異。

提綱5.3：戰略機遇不消解於經濟必要性中

關於時刻機遇和希望交叉點的政治意識組成了戰略意識；可能的，對必要性而言是不能簡約的意識；不是任意抽象自願之可能性的那種意識，不是一切都有可能的那種可能性的意識；而是由權威確定的可能性，其吉時的出現，為的是針對項目的決策，為了所要達到的目標。到頭來，意識來自關鍵時機，來自於對具體情況的反應。

提綱5.4：目的不消溶於運動，事件不消溶於過程

後現代囁語，心甘情願地為沒有歷史，沒有過去或未來的事件調和味道，為沒有危機的流動性，無破裂的連續性，無目標的運動調味。在後斯大林主義述說放棄的俚語中，未來的崩潰合乎邏輯

地結束在戰略的零點：即活在當下，無享受無束縛！因此，對明日失望沮喪的思想家滿意於鼓吹“不復存在的共產主義”，將其看作是“漸進永久的包括衝突和破裂時刻的運動，總是未完成的”。

[14] 鼓吹“新的革命概念”，“沒有革命的革命過程，革命的進化”，或更有甚者，朝著特別的時間緊迫性，“毫不拖延地更進一步”。[15] 申明：“曾經的革命已不再存在，因為不再有單一的時刻，讓各個演變具體化”，“不再有大躍進，大倒退，也沒有決定性臨界值。”[16]

當然，不再有單一的革命時刻，歷史的奇跡般的頓悟，但有決定性時刻和關鍵臨界值。然而，對連續性中的破裂所作的化解，是權力代表的合乎邏輯的對立面，該權力可能通過個人的非異化獲得：“霸權的逐步形成，或遲或早導致多數同意條件下的權力”，呂西安·色衛說。“或遲或早”定義了政治以外的時間，至少，根據本世紀及其試驗（西班牙，智利，印尼，葡萄牙），似乎是輕率的。首先，忽略了拜物教和商品化的惡性循環，忽略了控制再生產的條件。

提綱5.5：政治鬥爭不化解於社會運動的邏輯

社會和政治鬥爭之間，既沒有中國城牆也沒有水密艙。政治學產生和發明於社會內部，在對壓迫的抵抗中興起，該抵抗的形式是要求新的權利，把受害者轉換成主動者。不過，國家作為單獨機構的存在，同時作為整體利益和保證公共空間不落入私人胃口的擔保者的虛假化身，構成了特定政治領域，特定的力量關係，衝突語言，其中，社會對立在轉移和收縮以及反對和聯盟的遊戲中突顯出來。結果，階級鬥爭的表現方式，是在黨派之間政治鬥爭的形式下作幹旋。

一切都是政治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只在一定程度上和到某一點為止。“最後”，如果你願意，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在黨派和社會運動之間，不止簡單的分工，那裏運行著辯證關係，互惠和互補性。社會運動屈從黨派將意味著社會的國有化。

相反，在社會服務方面的政治，將迅速導致集體遊說活動，沒有一般意志的特殊利益的概述。因為解放的辯證法，不是漫長而寧靜的河：民眾的願望和期望是多方面的和矛盾的，往往分割在自由的苛求和安全的需求之間。事實上，政治的特殊功能在於闡明和總結它們。

注解說明5.5：鮮明而可靠的政治選擇消失不見，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階級替代的混亂被解釋成要精心設計五顏六色平臺的傾向，這些平臺被弄成不相干口號的拼湊，這些口號尋求吸引眾人，而其優先次序來自民意調查，在對上述事實做評論時，茲格芒特·鮑曼核查了社會運動幫助解答政治危機的能力。

他強調社會運動經受後現代性影響的方式：有限的壽命，軟弱的連續性，獨特困難的意外事故把個人臨時集結起來，問題的解決又再次讓人分散。這不是方案和領導人的錯誤，鮑曼說：這種不一致和間歇性所反映的，既不是這些不和諧時代的痛苦和短缺的累積特徵，也不是其綜合特徵。因而，社會運動要求大變革並提出大問題的能力不足。他們是其群眾政黨前輩的可憐替代品。這虛弱的碎裂，忠實地反映了國家主權的損失，在自由放任的商品中，國家淪為警署。[17]

在新社會運動的分散中，齊澤克見到了新主體的擴散，其背景是世紀失敗的後果——屈從。回歸到特殊階層，社會地位和機構團體，這應是非總體化和階級意識模糊化的合乎邏輯的後果。拒絕政治是對過去十年的“政治哲學”作出的社會政治限制的回應。然而，同樣的姿態，試圖在政治和非政治之間設限，而且除去政治的某些領域（開始於經濟），就是“出色的政治姿態”。[18]

對於拉克勞，解放事業將無限期地受到權利的污染，所以其完全的實現將意味著自由的整個滅絕。

在官僚共產主義破產以及凱恩斯改良主義破產的形式下，關於未來的兩個描述都到頭了，這會成為左派的危機。如果說可能的復興意味著“重建新的社會想像”，該說法仍然非常模糊，因為拉克勞沒有面對任何根本的選擇。

在反對他們的論戰中，面對中左派的新家庭主義，齊澤克堅持，“對供全球選擇的烏托邦式空間，保持開放，即使這個空間必須空著等待其內容”。實際上，左派必須選擇屈從或拒絕自由主義勒索，依照該勒索的意思，任何徹底改變的想法將會導致一個新的極權主義災難。

拉克勞對大同的思想沒有絕望。相反，運動的激進擴散分佈，使得各個運動的關聯不可思議，從這裡，他看到了後現代主義的同樣的失敗。

無領袖的、錯綜的、非中心的運動，迫於失敗，被置於主導話語內部的次要角落中？但是也有社會運動的重新部署，發生在社會再生產的不同範圍裡，發生在反抗空間的增值中，發生在對其相對自主權及其自己暫時性的肯定裏。

如果超越簡單的分化並且思考關聯性，那麼這一切不是消極的。如果不這樣做，不會有別的成果，只有分散各處的遊說（下屬的真正形象，就像主導者對被主導者的影響一樣，參考庫韋拉基斯）或威權的統一，該統一通過主人式的言語或科學的先鋒隊達成，那將把政治的普遍化減化為科學的普遍化（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新具體化），或者通過道德的先鋒隊達成，將之減化為絕對命令的普遍性。

在這兩種情況下，通過鬥爭領域的延伸和政治統一，不接近具體的普遍化過程。從這個角度看，沒有另外的出路，只有回到普遍性主題，資本本身，以及商品具體化所產生的多重統治效應。

來源：《國際觀點》，No.362, 2004年12月

丹尼爾·本薩德(1946-2010)是法國舉足輕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之一，著作甚豐。他曾經擔任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第四國際法語分支)及新反資本家黨領導。

注釋

- [1] 見亞曆克斯·卡尼科斯，“今日帝國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和新帝國主義”，書簽，倫敦，1994年。
- [2] 見車吉伯特·阿卡，“新的冷戰”，PUF，奔馬集，巴黎，1999年。
- [3] 見歐尼斯特·曼德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爾索，倫敦，1986年。
- [4] 看到維·加龍河，“二十一世紀革命家”，自由冠軍，巴黎。
- [5] 次開發呂西安·瑟維，“從頭開始”，論戰，巴黎1999。
- [6] 羅傑·馬特爾，“另類共產主義”，Syllepse，巴黎，1998年。
- [7] 霍布斯鮑姆，“極端時代”，企鵝，1994年。
- [8] 同上，第103頁。
- [9] 見凱薩琳·薩瑪莉，蜜雪兒·勒克恩那，安東莞·安透斯 在“共產主義批判”的文章，157號，2000年冬季。
- [10] 尼科斯·波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NLB，倫敦，1975年；博多洛和埃斯塔布萊，“法國小資產階級”，Maspero，巴黎1970年。也見於“政治經濟批判”，“共產主義批判”，“灰褐色手冊”雜誌合集。
- [11] 斯特凡·伯德和蜜雪兒·皮亞盧，“回歸工作條件”，Fayard，巴黎1999年。
- [12] “每日電訊報”，2000年2月22日。
- [13] 最近在匈牙利重新發現的，盧卡奇的文本已經出了英語版，標題是“尾巴主義和辯證法”，結尾篇由斯拉沃伊·齊澤克撰寫，爾索，倫敦，2000年。
- [14] 皮埃爾·紮卡，“即用共產主義”，Plón，巴黎，1999年。
- [15] 呂西安·瑟維，“從頭開始”，見上。
- [16] 羅伯特·瑪律泰利，“另類共產主義”，見上。
- [17] “茲格芒特·鮑曼給鄧尼斯·史密斯的信”，在鄧尼斯·史密斯，“茲格芒特·鮑曼，後現代的先知”，政體出版社，劍橋，1999年。
- [18] 齊澤克，見上，95頁。

從團結到分裂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約瑟夫·T·米勒¹

本文集中概述了1931年至1945年時期發生在中國的運動。它是準備可能出版的、更大的有關中國托洛茨基主義故事的一部分，但卻是重要的一部分。簡單地說，這是發展、鎮壓和分裂的故事。這是飽受各方十五年攻擊的故事，還涉及到政治理論上的，有時帶有個人性質的孤立的內部爭端。要反思這個運動的悲慘經歷，沒有一個時期比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合適了。

關鍵字：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中國共產主義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陳碧蘭（Chen Bilan），弗朗克·格拉斯（Frank Glass），彭述之（Peng Shuzhi），鄭超麟（Zheng Chaolin）



引言

張開在 1937 年加入中國托洛茨基運動，當時他是上海的一名年輕學生。在戰爭年代，他在上海被日本人拘捕和拷打。這位廣東中山人，九十五歲，是一個以“耄耋老人”為主要成員之運動的“耄耋老人”之一。這些人包括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少數從中國監獄釋放的人。所有這些人都曾積極致力於挑戰中央政權的政治鬥爭而受難，這個政權或者是蔣介石國民政府，或者是 1949 年後的中共中央政府（見：Zhang，2015 年；Zhang，1994）。

1.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CLC）的起源（1928-31）²

1925年至1927年間，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國學生中埋下了反對派種子，但這種反對派的正式成立，僅在1928年這些學生中的許多人回國後才發生。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和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也早早移植到了中國輿論場中。

直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的著作問世，提供給一些黨員使用，中國左派反對派的基礎才得以建立。

¹ 約瑟夫·T·米（Joseph T. Miller）：伊利諾斯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退休兼職政治學助理教授，電子郵件：joemillerzh@mac.com.

² 關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一般背景的英文介紹見：卡根（Kagan），1969 年；米勒（Miller），1979 年；本頓（Benton），1996 年；和本頓（Benton），2015 年。“中國左派反對派”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個術語經常互換使用。

到1930年，有四個不同的團體聲稱堅持托洛茨基政治觀點。他們是“我們的話”[*Women de hua*]；“無產者”[*Wuchanzhe*]；“十月社”[*Shiyue she*]和“戰鬥社”[*Zhandou she*]。

所有團體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和參與度，各自都有自己的出版物（Kagan[卡根]，1969：46-69；Sheng Yueh[沈越]，1971：164-83；Miller[米勒]，1979：161-5；Benton[本頓]，1996：2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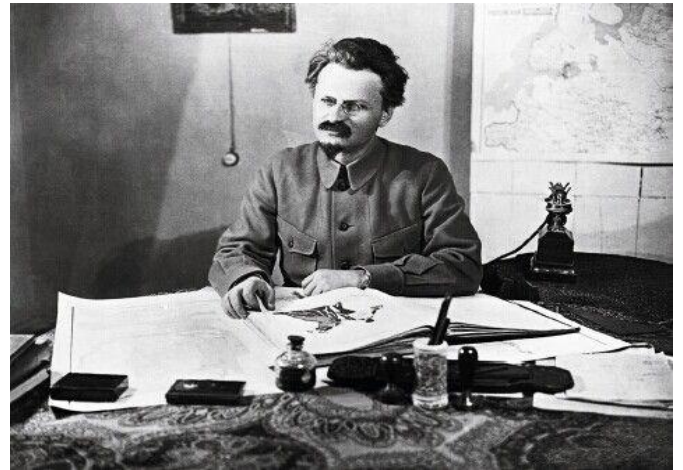
許多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對陳獨秀和彭述之的老一輩深感不信任，常常稱之為“陳彭集團”。³ 例如，據說彭述之對於年輕活動家持高高在上的姿態。這些攻擊只不過加劇了已經存在的分歧（Zheng，1997：244；Wang，1991：145-9；Peng，2016：318-20）。這些差異在許多方面成為運動中持續多年的摩擦因素。



當陳彭集團於1930年初開始出版“無產者”雜誌時，來自共產黨內的同情人數在增加。卡根估計，在1931年，甚至在走向統一之前，就有五百人的規

模（Kagan，1969：132）。

中共利用四個團體之間的爭端，圖謀削弱其任何吸納聚集成員的努力。列昂·托洛茨基成為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的主要推動者。自1929年末以來，他與各個團體定期通信。每個組織都認為自己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真正”代表。



托洛茨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回應了“我們的話”小組的聲明：

關於陳獨秀集團，我非常瞭解其革命時期的政策，那就是斯大林 - 布哈林 - 馬丁諾夫的政策，實質上就是右翼孟什維克的一個政策。

但是，N同志[劉仁靜]給我寫了一封信，說陳獨秀根據自己革命經驗採納的立場，相當接近我們的立場。不言而喻，這只能受到歡迎。不過，你在信中，斷然糾正了N同志的資訊。你甚至認為，陳獨秀並沒有違反斯大林的政策，而後者是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混和物。但到目前為止，我唯讀了一篇陳獨秀的綱領宣言，所以無法在這個問題上發表自己的看法（Evans and Block，1976：428）。

部分中的三個被翻譯成英文，1996：414-28

³ 該組織的創始文件“我們的政治意見書”（*Women de zhengzhi yijian shu*）全文見：Peng，1983：305-35。五個

當他們要向前邁進時，他就會挑戰那些批評，提供更大的政治清晰度。這是“國際反對派的政策，並不與任何特定的中國左派反對派站在一邊”，因為“我們的任何材料都未顯示有嚴重分歧存在而需要繼續分裂”。在信的結尾，他強烈推動團結，認為它應該是“真誠的”，並以“共同原則”為基礎。（Evans and Block，1976：441）

最後，為團結統一，組織了一個談判協調會，由四個小組的代表組成。他們在1930年夏季和初秋試圖制定一個議程。在協調會的每次會議上各個組織提出不同的意見，致使談判拖延。新老兩代革命者之間的分裂，繼續是一個主要的障礙（Wang，1991：143-4；Peng，2016：318-20）。

最終，“無產者”派別向另外三個派別的成員發了一封公開信。它駁斥了對其派別及其部分成員的不實指控。它還回顧了一些分裂現象，以及一些個人的派別活動。最後，它呼籲做出更多努力以便獲得沒有以前那些小爭端的統一。在團體和個人之間仍然存在某些政治問題需要解決，唯一成功的統一將是一個具有原則性的（“無產者”[Wuchanzhe]，1930年）統一。

在最近的採訪中，彭述之承認，他認為在達成原則性統一之前，需要更多的時間進行討論。王凡西則認為彭的立場，是完全反對統一的，是在要求所有其他派別解散併入“無產者”小組。彭反對把他的立場如此特徵化，認為他只是比陳獨秀更加謹慎而已（Wang，1991：148-9；Zheng，1997：248-50；Peng，2016：320-2）。⁴

⁴ 有關統一會議事實真相的爭議持續了多年。

⁵ 據王說，改名發生於1936年初。陳碧蘭（Chen Bilan）寫道，從1931年起，統一組織取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見

最終，在1931年1月8日的信中，托洛茨基為團結統一作了一個更強的結論。他直接指出：

首先，我會說，在研究新文件時，我終於相信，在進入統一之路的各個團體間，原則上沒有任何區別。在戰術中有細微不同，在未來，依據事件的進程，可能會發展成差異。然而，沒有理由假設這些意見分歧必然與以前分組的線條相吻合。...

親愛的朋友，現在就須把你們的組織和刊物團結起來！ 我們不能長期拖延統一的準備工作，因為那樣做，不用想就知道，那會造成人為的差異（Evans and Block，1976：492）。

他繼續說，“毫無疑問，明天以後的日子，會有新任務出現，帶來新的分歧。沒有這個，革命黨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他提醒中國同志們，中心重點應該始終放在具體的條件上（Evans and Block, 1976：498）。

這些通信至少暫時平息了反對派內部的一些爭端。統一會議於1931年5月1日開幕，開了三天多。中國左派反對派現在取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CLC)]⁵ 托洛茨基1929年的文件“中國政治形勢與布爾什維克 - 列寧主義反對派的任務”（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Tasks of the Bolshevik-Leninist Opposition）被同盟採納為其綱領基礎（Trotsky，[托洛茨基]，1947：139；Evans and Block，1976：402-8）。這並沒有結束爭端和分裂，只是讓它們暫停一段時間。表面上看，共產主義同盟很小，但其行動能力很高，因為其成員中經驗豐富的前黨幹部的比率很高。⁶

2.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CLC）領導班子的首

Wang, 1991: 173-4；陳，1980：32；Glass，1990 [1939]

⁶ 在中國的這些有限成功出現的當時，身處蘇聯的中國反對派活動分子正遭到劇烈攻擊。1931年5月至7月，“十

次被捕和監禁

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成立的三周內，它遭到了國民黨（GMD）當局的第一次打擊。1931年5月24日晚，上海的軍事當局在一個“叛徒”的幫助下，逮捕了九人同盟中央委員會中的六人。陳獨秀得以逃脫，因為情報部門不知道他當時的地址。彭述之由於從“一位同志在軍事總部的朋友”而獲得的最後消息，避免了被逮捕（彭，1976）。

王凡西是被捕者之一，他詳細描述了這次被捕的情況和這第一次監禁的實情（Wang F., 1974: 29; Wang, 1991: 162-7）。

據陳碧蘭介紹，“叛徒與蔣介石特務攜手合作。特務在公園的入口處、劇院、貨商店、主要街道交叉處等候。如果一個同志遇到了一個叛徒，他就會被便衣跟蹤並被逮捕（Ch'en，1980：32-3。另見 Wakeman，1995：132-6）。

不久之後，其他的逮捕也接踵而至。彭述之、陳獨秀、宋靜秀，這些僅有的還未被捕的中央委員會成員被迫轉入地下，不定期地在上海換地方。

3.日本軍國主義進入爭端

1931年9月18日，中國的內部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直接影響了共產主義同盟的增長和影響力。

當天夜晚，在瀋陽北部發生了爆炸事件，破壞

了一小段鐵路，這是滿洲日本陸軍官員陰謀的一部分。以此為藉口，日本軍隊‘在幾個小時內’就控制了瀋陽。這只是日本對中國領土長達十四年的入侵佔領的開始。雖然國際社會幾乎沒有注意到這個大事件，但日本方面這一舉動的直接結果是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意識的覺醒（Paine，2014：13）。⁷

國民政府雖然對這個事件作出了溫和的回應，但這些行為使中共在其仍然存在的地方激動了起來，也讓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餘下來的人及早採取行動，在城市組織群眾運動。

這個時期，同盟的努力主要是通過兩個期刊的發行，鼓動人心。首先，*火花* [or *Spark*, after *Iskra*] 是一本地下雜誌，上面刊登餘下來的同盟領導人的信件和文章，以及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譯。

在最早的‘火花’期刊中，有一期出版於第一次“上海事變”之日，同盟呼籲中共中央成員要求蘇聯通過共產國際施加其影響力，援助中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他們挑戰該黨，要它利用民族革命鬥爭，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防止對蘇聯的攻擊。他們主張重新動員城市職工運動，並要求從村一級起進行選舉，選出國民（或制憲）大會。蘇維埃地區的武裝力量應該與工人運動聯繫起來，反對日本和國民政府。最後，同盟呼籲中共內部各派圍繞著這些努力而團結起來（Shi Fan[石凡]，1932年）。

同盟的其他期刊，一個公開的週刊“熱潮”[Re

九人案件”在莫斯科進行審判，導致許多人被監禁。參見 Sin-Lin，2012：295-8。

⁷ 這一重要事件的範圍，正如作者的介紹，‘中國長期內戰

突然陷入中日之間的區域性戰爭，所以當1941年衝突成為全球性的時候，中國人進行的內戰處在區域戰爭中，這個區域則處在一場總體的全球戰爭中。’ Paine，2014：5

Chao]也呼籲武裝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據彭述之介紹，這一期刊在普通讀者中，包括在中國共產黨的讀者中，具有很大的影響。這可能是王明（陳紹禹）實行的政治組織政策的結果（（Ch'en, 1980：33；Peng，1972；Peng，1976）。

自1929年陳獨秀等人被驅逐出中共以來，在李立三的領導下，中共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負責人繼續實行宗派主義指控。

事實上，李立三本人已經按共產國際代表帕維爾·米夫（Pavel Mif）的要求，被逐出了黨的領導層。李先生被控為“半托派”。隨著王明的興起，在帕維爾·米夫（Pavel Mif）的幫助下，這種做法被強化，導致了黨內更高程度的分歧（Chang，1972：2：136,143；Saich，1996：285-8）。

至於日益增長的日本帝國主義行為威脅而發展的政治問題，對此，陳碧蘭聲稱，王明對抗日運動的宗派態度，以及後來對國民黨左翼領導下的十九路軍的宗派態度，走向一個奇怪的極端。在黨的機關報《紅旗》上，他鼓吹紅軍在農村與日本人戰鬥，但反對武裝群眾，不支持十九軍抗擊日本的戰鬥，（Ch'en, 1980: 14-15）。

中共官方政策的這兩個方面的結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極大不滿，特別是在上海。這使得許多黨員與共產主義同盟作更多的接觸，對有關政策的討論，使得一半以上的中共上海支部進入托洛茨基運動。這包括“幾十個重要的黨小組、郵政、電廠和紡織工人”（同上，Stranahan，1998：85-9）。

彭述之負責組織有關黨員參與各種討論小組。最終，公共租界內的黨員投入運動，中共上海支部

成為共產主義同盟的一個分支。那時，光是上海就有三百多人。彭在1972年寫信給理查·卡根指出，‘因為這些活動，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第一次能夠成為工人的堅強基礎，帶領他們在這個時期獲得許多罷工勝利。’這樣一來，共產主義同盟置身於抗日群眾運動中，又能夠超越上海，進軍北京、武漢、南京、廣州、香港等城市（Peng，1972；Peng，1976）。

中共《紅旗週報》以特別的敵意回應了同盟這一意想不到的增長。1932年4月8日的一篇文章，呼籲黨員學習和效仿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處理方法，將他們稱為“孟什維克”，避免同作者所說的“列寧主義”相連。該作者說，托洛茨基主義者是“社會法西斯分子，為反對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報紙寫文章。”指控清單還有：

中國托派主義者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武裝國民黨和其他反革命團體… 托洛茨基主義者利用郵政服務，以共產黨“左派”的名義寫信給警方，要求他們關閉我們的組織… 他們也向國民黨告密，使我們的組織被摧毀，我們的同志被逮捕。這證明了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

根據這位作者的說法，在中共組織內仍然存在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殘餘，“我們必須在理論和組織上與這些殘餘進行鬥爭”（Huang Juan, 1932: 13-15）。

這場鬥爭似乎優先於當時對日本侵略軍的任何實際抵抗。對以前受尊敬的黨領導者和積極分子的指控，使黨內的普通黨員對托洛斯基主義產生了某種好奇心。共產主義同盟明確表示，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這些攻擊事件並不輕率。他們讓黨在各個方面，在政治和理論上參與其中（Shi Fan，[石凡] 1932年）。

有意義的是，同盟的底層基礎多半是工人所在的城市，而中共已經轉向農村，從而躲避蔣介石的壓迫。當然這也意味著同盟很容易受到國民黨及其西方盟友的攻擊，更不用說越來越多的日本人攻擊了。

4.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領導人遭到逮捕、審判和監禁

1932年10月15日星期六下午，改組後的共產主義同盟中央會議在一私人住宅舉行。由於陳獨秀不舒服，彭述之擔任主席。突然，據彭說，“這個地方被警察包圍了”。這次會議的所有五名成員都被捕，所有書籍和其他文件都被沒收走了（Wang, 1973; Peng, 1976; Peng, 2016: 332-3）。

當天下午，警方查得了陳的下落，將其逮捕，同時另有五人被捕。在接下來的兩天內繼續逮捕，直到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多數主要幹部都被監禁。

這個大規模的圍捕引起了各地報紙的關注。例如，據“*中國評論*”報導，陳獨秀和“他的親信彭述之”被捕。據報導，這些囚犯於十月二十日抵達南京，立即被帶到“戰時軍事管制部拘留”，等待審判（*中國評論*，1932：5:43）。

陳獨秀在知識界是知名的公眾人物，新聞界密切關注這一案件。由於擔心軍事法庭立即把這些人處以死刑，中國社會中一些對陳友好的著名人物向蔣介石發電報，要求在民事法庭公開審理這個案件。據“*中央日報*”報導，審判前的調查將需要兩到四

個月的時間。結果，直到1933年4月14日（被捕之後的六個月），這次公開審判才在南京開始（Wang, 1973：第一部分）。

開幕當天，有八、九十人擠進法庭。對十二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指控列在“*中國評論*”發表的一份報告中：“被告人被控兩項罪名，即：（1）煽動傳播動亂性宣傳，（2）組織旨在危害共和國的團體；觸犯了關於危害國家罪的緊急處罰法的第2條和第6條”（同上，“*中國評論*”，1933：6：2；又見Qiang, et al., 1982: 160-91）。

審判持續了一個星期，最終判決於1933年4月26日發表。陳和彭被判處十三年監禁，剝奪公民權利十五年。他們判刑的嚴重程度反映了這個事實，即他們是共產主義同盟的領導人，他們把審判作為批評國民政府的公共論壇。然而，上訴到高等法院後，他們的刑期減少到八年（Ch' en, 1980：36；Qiang, et al., 1982：198-209）。

再次，隨著更多同盟人被監禁，運動沒有了中央組織。這使得香港、北京、南京、武漢、浙江、杭州、廣州、廣西等地的分支自行其是，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保存自己和實施行動。

5. 無中心的運動（1933-37年）

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受到這些幾乎致命的打擊的時候，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情況進一步惡化。1932年3月，日本成立了“滿洲國王朝”⁸，這是其控制中國領土之持續企圖的一部分。到1933年5月，對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領導層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審判結

⁸ 1932年2月29日，關東軍在瀋陽召開會議，討論滿洲未來。出名' Paine, 2014: 17。
它單方面將其名字改為滿洲，但是在國際上滿洲國的音譯更為

束後，日本在北方控制的地域更大。持續到1936年華北運動，也在1933年扎實地展開（Paine, 2014: 25-34, 36-9；見Benton, 1992 and 1999）。

為了根除共產黨勢力，蔣介石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行動”，延伸到1932年和1933年。他認為，在對日本人採取有效的軍事行動之前，必須摧毀共產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中國農村和城市革命運動的真正潛力的承認（Paine, 2014: 70-6）。

雖然同盟沒有組織中心，但仍有個人和團體願意在可能的情況下冒險進行組織和鼓動活動。此外，同盟期刊在1933年至1937年期間繼續出版。

據王凡西等人介紹，1932年至1934年間，保持活動的人物之一，就是還在上海的陳其昌。他和其他幾個人一直在出版‘火花’雜誌，還有一系列介紹托洛茨基主義立場的小冊子。這些剩餘的活動家，包括兩個“外國同志”，追隨國際托洛茨基運動的活動，通過外部接觸獲得材料（Wang, 1991: 171；Hinson, 2003: 123-40；Benton, 2015: 102-9）⁹

C.弗蘭克·格拉斯是來自南非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於1931年抵達中國，目的是以其任何可能採取的方式說明中國的運動。到1934年，他與陳其昌取得了聯繫。他曾擔任新聞記者，並在這艱難的歲月裡用其大部分工資來協助舉步維艱的托洛茨基運動。有趣的是，是格拉斯（王凡西給他取的中國名字為李福仁）使得哈樂德·以撒（Harold Isaacs）同情這個運動的。（Hinson, 2003: 240n23, 83-6）

以撒也作為新聞記者來到中國，並於1932年，以“組織外”的方式，即用他的言論，與中國共產黨迅速取得聯繫。他發行了‘中國論壇’（China Forum），一本反映共黨官方中國事務觀點的英語雜誌（Isaacs, 1934: 76: 7）。

他對共產黨不再抱有幻想，因為他發現嚴重的扭曲和誇張是中國以及國外共產主義宣傳的特徵。起初他把這些歸結於‘個人的無知或無能’，但是他很快意識到，這是共產國際通過中共中央特意所作的政策決定。

以撒寫信給中共中央，辭去‘中國論壇’的工作，在信中，他指責中央退出城市勞工階級中心，把一些勞工領袖帶入了‘蘇區和紅軍。’

事實上，把最有覺悟和最進步的工人階級成員調離工人階級環境，並把他們送到蘇區，這種通常做法，是轉移錯誤焦點的良策，因為該錯誤的本質是癱瘓城市的工人階級運動（同上）。

在他努力批評國民黨及其做法時，遭遇到反對。他未被允許報導對陳獨秀等人的審判。黨要求他只發表對陳的攻擊，以證明國民黨的做法是正確的。他拒絕了。由於這些和那些原因，以撒決定關閉‘中國論壇’。黨要求他交出印刷設施，但他拒絕了。（同上）¹⁰

王凡西、陳其昌、弗蘭克·格拉斯繼續出版‘火花’雜誌，還有名為‘鬥爭’的新雜誌，據王介紹，

⁹ 陳其昌在1943年被日本警方逮捕、磨和處決。彭述之對陳其昌的批評，見 Peng, 2016: 358-61。

¹⁰ 與中共決裂之後，以撒把印刷社和印刷鉛字捐給了共產主

義同盟。然後他去了北京，開始研究‘中國革命悲劇’的原因。Hinson, 2003: 127-8；Isaacs, 1985: 28-32

這份雜誌‘到1936年秘密發行了兩百到三百份’。王也承認，弗蘭克·格拉斯在幫助維持運動的發展上，起了關鍵作用，而且他自己犧牲巨大(Wang, 1974: 30)。

這兩個期刊的發行，使得運動獲得新增長，包括香港在內，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香港也出版了自己的雜誌，名為‘火星’（同上）。

然而，隨著這些發展的徵兆，王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被國民黨警察逮捕。他們監視弗蘭克·格拉斯的住所，跟蹤‘任何訪問過他的人’。直到那年十一月，在南京遭到日本人的嚴重轟炸後，王才被釋放。格拉斯也在這個時候離開了中國去美國旅行，並同托洛茨基一起去墨西哥做訪問（同上，Hirson, 2003: 140-2）。

這個運動又一次受到壓力，需要尋找新途徑，以便在沒有中央組織的情況下繼續運作。

6. 關於第二次統一戰線的論戰

到1936年下半年，由於臭名昭著的“西安事變”，人們呼籲建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第二次統一戰線”。蘇聯推動此事，因為它有助於防範來自其東部邊界的日本攻擊。在內部存在分歧的情況下，中共仍然接受了此計劃(Paine, 2014: 90-104; Sheng, 1997: 57-62; Wang, 1991: 218-20)。

在‘鬥爭’雜誌中，共產主義同盟照樣質疑中共與國民黨發展更密切合作關係的努力。正如蘇聯所宣導的那樣，這本雜誌認為，“在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下，相信‘一個國家先實現社會主義’的紳士們，失去了大腦，完全失去了對無產階級國際革命

的信心，他們完全放棄了階級鬥爭的基本策略。”在西安事變之前，同盟批評毛澤東再次與中國資產階級聯手（鬥爭，Dou Zheng, 1936年1月10日）。

1936年8月10日，毛澤東向救國會四名成員發了一封冗長的信，聲言‘向你們和全國人民致意，我們同意你們的聲明、方案和要求，真誠希望與你們和任何願意參與這一鬥爭的組織或個人合作，按照你們的建議和要求，進行共同抗擊日本人、拯救國家的鬥爭。’（Schram, 1999年: 295）。儘管南京政府的“圍剿”在繼續進行，毛澤東說：

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際，我們不願繼續任何內戰屠殺同胞。如果他們不攻擊我們，如果他們不干涉打擊日本人的國軍，我們就不會攻擊南京中央軍隊或其他軍隊…我們願意與任何軍隊、任何政黨、任何派別合作，只要他們贊成准許抗日、反賣國賊和愛國運動的完全自由。（Schram, 1999: 296）。

緊接此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強烈譴責毛澤東的立場：

這是共產黨和紅軍領導人，給銀行家章乃器、教育家陶行知、生活書店老闆鄒韜奮、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沈鈞儒的信。誰會相信中國的工農大眾會遵從這四個人的方案，並通過他們，遵從蔣介石的方案呢？這是什麼意思？它表現了中國斯大林黨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全面投降。這是對基層黨員利益的根本排斥！（鬥爭，Dou Zheng, 1936年11月15日）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遭遇內戰和外部威脅，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活動分子被普遍視為失敗者，甚至是外人和“叛徒”。他們一直堅持反對國民黨和共產

黨的政策，同時也試圖組織工人成為革命力量。

同盟從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批判了‘第二次統一戰線’的觀念，認為‘這個統一戰線是在共同綱領下無產階級各黨派的政治合併，意在對付敵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沒有共同利益，只有不斷的衝突。’這是試圖重申 1925 年至 1927 年的歷史失敗，並強調所有人民的‘民眾陣線’和一個真正的“統一戰線”之間的區別（*鬥爭*，*Dou Zheng*，1936 年 7 月 15 日）。¹¹

7. 釋放，新的可能性，新的分裂

這就是陳獨秀和彭述之在 1937 年 8 月從南京監獄釋放出來時的政治現實。監禁歲月給這兩個人沉重壓力。彭先生的弟弟道之病死於監獄而未經治療。他們的友誼和同志關係在監獄中受到很大的壓力，現在兩人之間有深刻的分歧。

在監獄期間，關於蘇聯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制度的概念，陳對一些托派主義信條，在看法上有了根本性的分歧。在監獄期間，他和彭就這些問題交換了意見。彭堅持其稱之為“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Lin, et al., 2012: 250-61; Peng, 1983: 85-105; Chen, 陳, 2010: 449-66; Peng, 2016: 340-2)。

他們從監獄釋放後，陳前往武漢，在那裡繼續與運動保持遠距離接觸。彭終於回到了妻子和女兒生活的上海，希望能夠重振共產主義同盟(Zheng, 張, 1989: 1012-19; Peng, 2016: 355-6)。

11 月在上海召開了同盟臨時會議。那些還在地下的人和最近從監獄中釋放的人開會討論群組織的未來。早先的全國會議於 1935 年末或 1936 年初舉行(Glass, 1935 年; Wang, 1991: 175-8; Hirson, 2003: 133-

4)。

這次 1937 年的會議通過了一項支持國民黨人進行抗日武裝鬥爭的決議，但批評國民政府的政治基礎。會議還選舉了“臨時中央委員會”，決定繼續出版‘*鬥爭*’雜誌(Peng, 1972; Peng, 2016: 362-3)。

王凡西於十一月被釋放後，他首先前往武漢，同陳獨秀待了一段時間。據王介紹，陳先生當時心情沮喪，但政治觀念仍然清楚，陳建議說，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不應該試圖重建組織，而應該與所謂的“民主”黨派，如救世會、民主同盟和農工黨，這些當時被稱為“第三黨”的黨派合作。王先生不同意這一建議，拒絕代表陳參加這些組織的會議，而是前往上海，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取得聯繫，重新加入了‘*鬥爭*’雜誌編輯委員會(王, 1974: 31)。

再次，這一時期的運動又有了新的增長。地區組織在上海、北京、廣州、香港以及廣西和浙江等省重新建立。在彭述之被監禁期間，陳碧蘭發展了友人，因而獲得了必要的資金，可用於設立期刊出版單位。一個新的刊物‘*動向*’現在可以公開發行了。此外，在此期間，同盟成員鄭超麟、王凡西將托洛茨基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為該組織籌集資金(Ch'en, 1980: 37; Wang, 1991: 229-31)。

隨著同盟的重組和增長，中共的指責更加強烈，中共基地現在延安，毛澤東擔任其軍事委員會主席。以王明[陳少禹]、周恩來、博古為首的長江局位於武漢。對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政治攻擊來自這些中心。

反托派運動最喜歡的一個策略，是惡毒地將同盟及其成員描繪成“服務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法西斯主義者”或乾脆就是“法西斯主義者”，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同盟活躍在日本戰線後

¹¹ 關於托洛茨基對“民眾陣線”與“統一戰線”的評論，

見 Evans and Block, 1976: 594-6。

面或日本佔領區內，這些指控，對運動以外的許多人來說，似乎是合理的。此外，任何個人，只要稍有一點漢奸或“叛徒”（由中共認定的）嫌疑，都被自動地譴責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即使他們與同盟沒有任何聯繫（Chen, et al. 1939; Jun Xing, 2005）¹²

張慕陶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表明這些指控是如何進行的。在1938年的一段時間裡，張是中共最喜歡攻擊鞭打的男子。在王明康生等人的演講和文章中，他被譴責為“托派叛徒”。據彭述之介紹，像三十年代中國的許多其他年輕人一樣，張在北京學習期間，受到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的影響。張從未加入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但去過山西，在那裡擔任綏靖主任閻錫山的秘書，被毛澤東譴責為“叛徒”。所以，通過將張過去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興趣與“叛徒”聯繫起來，中共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叛國分子”（*社會主義訴求*, *Socialist Appeal*, 1938: 2: 10; 彭, 1977）的指控。

中共當局也指責彭述之和陳獨秀是接受日本金錢出賣國家的人。彭在湖南的朋友看到過的中共聲明，稱他住在上海‘在日本軍隊的保護下，日本士兵守衛著他的家。’當這位朋友回到上海發現這不是真的時候，‘他的同情立刻離開了中共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對中共如此囂張表示憤慨。’即便是周恩來也拒絕了對彭或陳獨秀的這種指責（Peng, 1976）。

對陳獨秀的追究有另一個效果，他們把許多中國學者的憤怒引到了中共集體的頭上。1938年在廣州發表了一系列譴責中共詆毀陳的文章。雷宇桐發表聲明，要本著杜威委員會(Dewey Commission)的

精神，追求真相，進行這一工作，杜威委員會成立於1937年，目的是調查莫斯科審判中的斯大林指控（Lei, 1938）。

這個文集中的一個重要例子，是鄭學稼“給中共黨員的公開信”。鄭教授被指為“托派叛徒”之一，雖然自從1927年以來他一直聲稱自己不是任何黨派或派別的成員。中共稱他為“南京政府的喉舌”和“法西斯主義者”，因為他呼籲他們結束反對國民黨的暴動。鄭先生回答說，“由於法西斯主義是在垂死帝國主義勢力中產生的一個政治現象，中共似乎分不清牛馬”。（同上，Zheng, 1976）。

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密切關注發生在中國的這些事件，特別是因為這些攻擊明顯是斯大林共產國際發動的。美國的托洛茨基新聞社定期發表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導（*Socialist Appeal*, [社會主義訴求], 1938: 2:22）。

反對中共誹謗運動的一個有效途徑，是各個城市工人運動中同盟的自身行動。例如，在1938年八月底和九月初，為反對日本海運，在香港太古碼頭進行的為期十天的罷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成員是直接參與者。‘*社會主義訴求*’報導了罷工及其結果：

在工人的心目中，第四國際在罷工之前和期間的活動，完全駁斥了斯大林主義分子對其所謂“叛國分子”和“日本間諜”的毀謗，以至於中國斯大林主義者覺得不得不用他們著名的格別烏（G.P.U.）辦法讓第四國際從現場消失。

他們與香港警察當局密切合作，給後者提供虛假

¹² 有關此期間的“綏靖者和叛徒”的最近討論，見 Coble,

2015: 75-9。

文件，他們終於成功地跟蹤了我們的一些同志，使這些同志立即被逮捕並遭刑求（*Socialist Appeal*，‘社會主義訴求’，1938：2:36）。

中共難以解釋，為什麼所謂的“叛徒”會深深地參與工人的抗日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黨只是無視同盟的活動，而不是更多地報導那些活動。然而，他們毫不猶豫地利用地方當局，或者英國當局或者中國當局，來幫助鎮壓同盟。這樣做有一定的互利關係，因為英國當局並不希望周圍的托洛茨基主義分子也同共產黨或國民黨那樣。人們可能懷疑，地方當局和中共暗地裡有一個協議，作為“統一戰線”的一部分，也即，為了更有效地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社會的和平是必要的（Chu，2010：34-5）。



8. 對戰爭態度的不同：導致1941年的分裂

不久之後，在這些多重攻擊的壓力下，隨著國際關係的重大轉變，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內部的爭論也重起。到1939年秋天，隨著“斯大林-希特勒條約”的簽訂，對中國和歐洲戰爭的不同意見成了三方分裂的

基礎。這次辯論討論的三方，總的代表是同盟的四位高層領導：陳獨秀、彭述之、王凡西、鄭超麟。

陳認為，這場戰爭是民主與法西斯之間的根本鬥爭，沒有任何特別的階級內容。他認為“民主”國家的革命者應該無異議地支持戰爭行動。在支持國民黨戰爭行動的同時，共產主義同盟也應該停止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批評（Wang，1991：228；Kuo，1975：225-38；Lin，et al. 2012：436-40）。



王凡西說，他在1940年末寫過一文：“太平洋戰爭與中國抗戰”，發表在‘鬥爭’雜誌上。他對戰爭的基本立場是：

一旦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當時由國民黨控制）就必須被視為更廣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國民黨作為美帝國主義的小盟友必將會調整其計劃，以適應美國最高司令部的大戰略，結果，民族解放運動必將從屬於美國取代日本成為東亞主導國家的野心，… 我們對國民黨領導的戰爭的態度，應更多地符合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宣導的革命政策。我們應更加重視革命的勝利，而不是戰爭的勝利（Wang，1991：234）。

據王介紹，在討論該文時，編委會表示同意該文觀點，編委包括陳其昌、鄭超麟、樓國華、劉家良。他把這個立場稱為“革命失敗主義”，根據他對這一概念的理解，那基本上意味著革命綱領不應該在戰爭期間被擱置，而應該盡全力把革命的控制推向整個國家。他也稱這為“革命勝利主義”，因為“只有革命才能真正戰勝帝國主義”。鄭超麟同意王，也採納了這個立場，雖然王認為他們之間存在有小差異（Wang, 1974: 32; Zheng, 1997: 254; Benton, 1996: 86-7）。¹³

這次辯論以彭述之為代表。他的主要論據見於1941年4月4日的文章“對兩條路線的鬥爭”中。他回顧了列寧關於黨內鬥爭中的立場，認為自共產主義同盟創立以來就存在於成員之間的分歧，只是因為日本侵略事件的壓力，導致整個運動的孤立而加劇。他回顧了自1934年以來他自己與陳獨秀之間差異的發展，將陳代表的“戰爭”觀點描繪成“右派的”，因為彭認為，他們完全無原則地屈從國民黨的勢力（Peng, 1983: 138-71）。¹⁴

彭進一步認為，“革命失敗主義者”的觀點是“極左的”。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這種反對，反映了對列寧“革命失敗主義”和不斷經濟革命理論概念的全面誤解。他聲稱要保衛托洛茨基關於戰爭的基本方法，其中包括考慮到美國的潛在角色（同上）¹⁵

¹³ 應該注意的是，劉家良很快就轉而反對王的立場。

¹⁴ 此文最初發表在‘保衛馬克思主義’叢書，該系列出版了許多發生在1941年至1945年期間的同盟裡的辯論文件。

¹⁵ 王凡西指出，雖然採取彭的立場者原來是少數，但該立場曾經成了第四國際的主要路線，通過了其自己關於戰爭的決

9. 列昂·托洛茨基論抗日戰爭

托洛茨基的看法反映在他給Diego Rivera的一封信中，時間是1937年末，在日本發起對中國最兇惡攻擊的不久之後。他指出，所有中國工人組織的職責，是積極參與到抗日戰爭的前線，但不要放棄自己的綱領和獨立活動（Evans and Block, 1976: 567）。

他回應了這是向蔣介石投降、放棄階級鬥爭的指責。認為：

泛泛而談“革命失敗主義”，不區分剝削者國家和被剝削的國家，是為帝國主義者服務而製作的一個痛苦漫畫。在遠東，我們有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而日本就在我們眼前把它轉變成一個殖民地國家。日本的鬥爭是帝國主義和反動的，中國的鬥爭是解放和進步的（Evans and Block, 1976: 568）¹⁶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怎麼會成為“解放與進步”鬥爭的一部分呢？難道工農運動反對他們，即便不多於，可也不會少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吧？托洛茨基的回應令人信服：對蔣介石，他的政黨，或整個中國的統治階級，我們都不會有幻想，就像馬克思恩格斯對愛爾蘭和波蘭的統治階級毫無幻想一樣。蔣介石是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劊子手。但是，今天他被迫為了中國的殘存獨立而與日本進行鬥爭。明天他可能背叛。是有可能的。很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今天他正在努力鬥爭。只有懦夫、歹徒或白癡才

議。見Wang, 1991: 234-5。

¹⁶ 關於應用在國際托洛茨基運動中的“革命失敗主義”概念，有非常有用的歷史回顧和分析，見Joubert, 1988: 1: 3

會拒絕參與這場鬥爭（Evans and Block，1976：568）。

革命者必須察看任何戰爭中的交戰方所持的國際立場：

日本和中國乘的不是同一架歷史飛機。日本的勝利將意味著中國受奴役，意味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結束，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可怕的增強。恰恰反映，中國的勝利意味著日本發生社會革命，也就是說，意味著中國的階級鬥爭，在不受外來壓迫束縛的情況下，自由發展（同上）。

而且，以下作為對“我們的中國朋友”（即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進一步警告：

明天與國民黨同盟的格別烏（GPU）將代表中國朋友作為“失敗主義者”和日本的代理人。他們中最好的人，以陳獨秀為首，可以在國內和國際上被出賣和陷害。有必要強調，第四國際站在中國一方反對日本。而且同時我要補充，它沒有放棄其綱領或獨立性（Evans and Block，1976：570-1。重點在原著）。

17

當然，托洛茨基的這些觀點，都是出現在其遭暗殺之前，在抗日戰爭擴大到世界範圍之前。隨著情況的變化，共產主義同盟（以及更廣泛的第四國際）內部的辯論也在繼續。隨著托洛茨基的死亡，國際運動中的早期分裂也嚴重了（Drucker，1994：106-38,148）。¹⁸

10. 理論、戰略和戰術差異導致分裂

1941年7月13日，在共產主義同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項題為“我們對德-蘇戰爭和即

將來臨的美日戰爭的態度與政策”的政治決議。這一決議指出，“所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後國家，包括蘇聯在內，將捲入即將來臨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國抗日戰爭與蘇聯反德戰爭的命運現在已經聯合起來了”。該文件還討論了少數人關於“失敗主義”的一些立場，指出了他們的不足之處。同盟多數人為戰爭的行動提出了一長串的建議（中國共產主義同盟，1941年）。

例如，他們要求完全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領導罷工，武裝抗日，並且向各黨成員，除了叛國者以外，推進其政治綱領。他們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建立鄉村農民協會，以及徵收土地。對於他們與中共的關係，同盟認識到政治上必須繼續批評該黨，但對於目前的抗日戰爭和蘇聯捍衛戰，有必要在實際行動中同其進行合作。最後，決議討論了游擊隊的組織，對日軍的騷擾行動，以及打擊南京汪精衛的具體行動（同上；Liu，2005：286-90；Li Fu Jen，1941；Fourth International，1941年）。

這些少數人是怎麼來的？首先，有人認為，陳獨秀實際上與托洛茨基運動有分歧。這是多年來的爭論源頭，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是這樣的。早在1948年，王明遠[王凡西]寫道：

我們可能會猜測，如果陳沒有去世，他可能會把餘年投入到第四國際的事業。對此，我們不能給出這個問題的明確答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也說他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分裂，不能被認為是最後確定的（Wang，1948年）。

一些學者認為，陳的最後幾年，是同任何激進運動最後切割的幾年，回歸到了以前的民主觀點。在

¹⁷ 另外，見“關於戰爭的決議”，“Evans and Block”，1976，574-7。

¹⁸ 關於第四國際內部爭論的材料彙集，見 Matgamna，1998。

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不知道陳繼續與共產主義同盟維持遠距離的聯繫，直到1941年的大會。他們呈現了一個孤獨怨恨者的圖畫，一個不滿現狀的流亡者，直到1942年5月27日，他六十二歲離世（Hu Shi，1964年，Zheng，1980：200-1；Feigon，1983：220-4）。

王凡西和鄭超麟的少數派與同盟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聯繫。王在回憶錄中說：

我們對那次會議的準備與進行都不滿意，但接受了它的結果，我們自安於少數派地位。不過我們要求一個權利，即在機關報《鬥爭》上開闢一討論欄，雙方繼續進行問題的闡述。（Wang，1991：235-6）。

新中委會拒絕了我們的要求。我們乃自行出版內部刊物，後來我們命名這個內部刊物為《國際主義者》。這導致多數派的譴責。到1941年5月，共產主義同盟經過十年脆弱的統一，現在真正的分裂了（Liu，2005：279-96；Chen，2010：473-4；Peng，2016：390-1）。

到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佔領香港和上海，控制了中國更多的地方，共產主義同盟及其分裂團體的實際影響力大為受限。同盟中央組織與地方單位之間的溝通被徹底切斷。所有的活動都變得當地語系化了。

據王凡西介紹，發動和組織工人中的工作仍在繼續，比如在上海設立學校。他的小組還設法繼續出版了《國際主義者》雜誌一段時間，大多數文章由鄭超麟撰寫。王批評彭的多數派讓《鬥爭》雜誌在抗戰期間停刊。至於“游擊活動”，王指出，它們並不算太多。但是，他確實提供了有關托洛茨基主義者對

日本軍隊作各種鬥爭嘗試的一些資訊：

一些同志以個人身份加入江蘇南北的抗日游擊隊，還有些不知名的人，曾經在游擊隊裡起過相當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兩批中國托派人士，由廣東的陳仲禧領導，以及由山東的王昌耀、張穎新夫妻領導，成功組織了幾千人強的游擊隊，與日本人打了近兩年。

在日本軍隊，或日本軍隊加上中共隊伍無緣由的襲擊下，這些團體最終被消滅。（Wang，1991：238；Liu，劉[劉平梅]，2005：177-245）

對於同盟的中央領導，許多幹部因日本控制大城市而受到逮捕。許多人被處決。在上海，彭述之及其家屬在“恐怖條件”下進入地下生活。他通過改名（陳松濤）在大夏學院謀得教師職位，而妻子則改名為陳碧雲，並以此名發表關於婦女和青年的文章。彭通過他的教學，開始與不瞭解他真實身份的左傾學生進行接觸。有些學生甚至去他家訪問了他和他的妻子，他們在那裡討論政治和社會問題（Peng，1976；Chen，2010：476-502；Peng，2016：394-403）。

11. 衰落的托洛茨基主義潛藏地下伺機待發

在1927年的失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在中國托派運動中，發生了很多事情。在初創佈局啟動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統一運動開始了20世紀30年代的十年，帶有一些樂觀的氣氛。不久之後，國內勢力的壓迫，侵略戰爭的開始，加上內部爭端，使同盟陷入困境，發展與團結起伏不定。（Peng，1947；Wang，1948a；Wang，1948b）。

上海等地的托洛茨基‘中心’現在被日本帝國

佔領，領導幹部分散在中國各地，同運動的聯繫被切斷了。至少在戰爭期間，這個運動多少有些癱瘓，儘管沒有完全失效。

關於運動在戰時和戰後，能有些什麼作為的爭論，多年來一直在持續。有人傾向於低估托洛茨基主義者在戰時的實際參與程度，對此責難，張開認為，在戰爭期間，托洛茨基主義者所做的很多事情遠不止宣傳，許多人在城市和戰場上犧牲自己，進了監獄，遭受折磨和死亡。最近，他詳細介紹了上海、廣東、廣西、山東、江蘇、浙江、溫州、香港、重慶等地的托洛茨基主義實際活動。這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斷遭受攻擊之運動的記錄。

在詳細回顧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這段時期遭受的一切壓力和攻擊後，張總結道：

在這些最困難的環境下，這個運動能夠在工人階級中維持一個革命中心，為未來的復蘇作好準備。這一堅決的努力必須得到承認（Zhang，張，2005）。

隨著戰爭的結束，在內戰中將有新的希望、新的機會，但並沒有保障，讓這個運動可以從十五年不斷的攻擊、中斷和內部糾紛中恢復過來。

(2016年9月11日收到，2016年10月11日修改，2016年10月23日定稿)

□ 參考文獻

Benton, Gregor. 1992. *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山火：紅軍在南方的三年戰爭，1934-1938。加州大學出版社。

—. 1996. *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中國城市革命者：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史研究，1921-1952年。新澤西：人文出版社。

—. 1998. Edited and Translated. *Chen Duxiu's Last Articles and Letters, 1937-194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編譯。陳獨秀最後的文章和信件，1937-1942年。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

—. 1999.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新四軍：長江淮河一帶的共產黨抗日，1938 - 1941年。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

—. 2015. Edited. *Prophets Unarmed: Chinese Trotskyists in Revolution, War, Jail, and the Return from Limbo*.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編輯：徒手先知：處於革命，戰爭，監禁中的中國托派及其從地獄邊緣的返回。萊頓：Brill出版社。

Chen, Bilan. 2010. *Zaoqi Zhonggong yu Tuopai: Wode geming shengya huiyi*. Hong Kong: Tiandi chubanshe. 陳碧蘭。2010. 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Ch'en, Pi-lan [Chen Bilan]. 1980. 'Looking Back Over My Years with P' eng Shu-ts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New York: Monad Press. 陳碧蘭。1980. '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刊載於《掌權的中共》，紐約Monad 出版社

Chen, Shaoyu, et al. 1939. *Tuopai zai Zhongguo*. Jinhua, Zhejiang: XinZhongguo chubanshe. 陳紹禹等，1939. 托派在中國，金華，浙江：新中國出版社

Chu, Cindy Yik-yi. 2010. *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 Capitalists: 1937-199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中國共產主義者和香港資本主義者：1937-1997。紐約：帕戈理夫 麥克米蘭出版社

Coble, Parks M. 2015. *China's War Reporters: The Legacy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國戰爭記者：抗日戰爭傳說。劍橋：哈佛大學

- 出版社。
- 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1941. 'Women dui De-Su zhanzheng ji pojinde Ri-Mei zhanzheng zhi taidu he zhengce,' *Zhongguo gongchan zhuyi tongmoeng zhi zhengzhi zhuzhang*. Guomindang Investigation Bureau.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1941. '我們對德蘇戰爭暨迫近的日-美戰爭之態度和政策,'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之政治主張*. 國民黨調查局
- Drucker, Peter.** 1994. *Max Shachtman and His Left: A Socialist's Odyssey through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馬克斯·沙特曼及其左派：一個社會主義者穿過“美國世紀”的艱苦跋涉。新澤西：人文出版社。
- Evans, Les and Russel Block.** 1976. Edited. *Leon Trotsky on China*. New York: Monad Press. 編輯。列昂·托洛茨基論中國，紐約：Monad 出版社
- Feigon, Lee.** 1983.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陳獨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 Fourth International.** 1941. 'The Danger of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China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ist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Volume I Number 5. 第四國際 1941, “美國干預中國的危險和第四國際成員的任務” *國際公報*。第一卷第5號
- Glass, Frank.** 1935. *Minutes of Meeting of Provision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Bolshevik-Leninists)*.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臨時委員會會議紀要（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互聯網文件案。
- Glass, C. Frank.** 1990 [1939]. 'The 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Revolutionary History*. Volume 2 Number 4.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革命史*。第2卷 第4期
- Hirson, Baruch.** 2003. *Frank Glass: The Restless Revolutionary*. London: Porcupine Press. 弗蘭克·格拉斯：無休止的革命。倫敦：Porcupine出版社
- Hu Shi.** 1964. 'Chen Duxiu zuihou duiyu minzhu zhengzhi de jianjie xu,' *Zhuanji wenxue*. Volume 5 Number 4. 胡適。'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敘,' *傳記文學*。第5卷第4期
- Huang Juan.** 1932. 'Sidalin tongzhi de xin yu fan Tuoluosiji zhuyi de douzheng,' *Hong zhoubao*. Number 35. 黃娟。1932。'斯大林同志的心與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 *虹週報*, 第35期
- Isaacs, Harold. 1934. 'I Break with the Chinese Stalinists' . *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Volume 1 Number 3. “我和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決裂”。*新國際*。第1卷第3期。
- _____. 1985. *Re-Encounters in China: Notes of a Journey in a Time Capsul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 _____. 1985年。再遇中國：記時間梭艙之旅。香港：聯合出版社。
- Joubert, J.P.** 1988 [1985]. 'Revolutionary Defeatism' *Revolutionary History*. Volume 1 Number 3. '革命失敗主義' *革命史*, 第1卷第3期
- Jun Xing [Zhang Kai].** 2005. 'Shixuejie pingfan 'Zhongguo Tuopai shi Hanjian' cuoan' *Shiyue Pinglun*. Volume 32 Numbers 2/3. 張開, “史學界平反‘中國托派是漢奸’錯案”, *十月評論*。第32卷第2/3 期
- Kagan, Richard C.** 1969.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and Ch' en Tu-hsiu: Culture, Revolution and Pol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sis. 中國托派運動和陳獨秀：文化，革命與政治。賓夕法尼亞大學。論文。
- Kuo, Thomas C.** 1975. *Ch' en Tu-hsiu (1879-1942)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outh Orange: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陳獨秀(1879-1942)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南奧蘭治：Seton Hall大學出版社。
- Lei Yutong.** 1938. Edited. *Zhongguo gongchandang gongji Chen Duxiu dengde fanxiang*. Guangzhou: Xindong chubanshe. 雷雨桐, 1938, 中國共產黨攻擊陳獨秀等的反響。廣州：心動出版社
- Li Fu Jen [Frank Glass].** 1941. 'Report on the Chinese Situation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of China'

- International Bulletin*. Volume I Number 5. 李福仁。1941。
《中國形勢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活動情況的報告》，*國際公報*，第一卷第5期。
- Lin Zhilang, Wu Mengming and Zhou Fujiang**. 2012. Edited. *Chen Duxiu wannian zhuzuo xuan*. Hong Kong: Tiandi. 林致良，吳孟明，周履鏘。《陳獨秀晚年著作選》，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 Liu Pingmei**. 2005. *Zhongguo Tuopai dang shi*. Hong Kong: Xinmiao. 劉平梅。《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
- Matgamna, Sean**. 1998. Edited. *The Fat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st Texts of Critical Marxism*. Volume 1. London: Phoenix Press. 俄羅斯革命的命運：批判性馬克思主義的迷失文本。倫敦：鳳凰出版社。
- Miller, Joseph T**. 1979.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Trotskyism: The Role of a Permanent Opposition in Commun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Thesis.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政治：共產主義永久反對派的作用。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論文。
- Paine, S.C.M.** 2014.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亞洲戰爭，1911 - 1949年。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
- Peng Shuzhi**. 1947. "Trotskyism in China" *Fourth International*. Volume 8 Number 7 彭述之，1947，'中國托洛茨基主義' 第四國際。卷8第7期
- _____. 1966. *Professor Robert A Burton Interviews*. 1966年。11-13 August. 1966年，Robert A Burton教授訪談。8月11-13日
- _____. 1972. *Letter to Richard C. Kagan*. 12 January. 1972年。給 Richard C. Kagan 的信。
- _____. 1976. *Joseph T. Miller Interviews*. 9-16 January. 1976年約瑟夫·米勒訪談。1月9日至16日
- _____. 1977. *Letter to Joseph T. Miller*. 28 July. 1977年約瑟夫·米勒訪談。7月28日
- _____. 1983. *Peng Shuzhi xuanji*. Volume 1. Hong Kong: October Bookshop. 1983 彭述之選集。卷1，香港：十月書店
- _____. 1984. *Peng Shuzhi xuanji*. Volume 2. Hong Kong: October Bookshop. 1984 彭述之選集。卷2，香港：十月書店
- _____. 2016. *Peng Shuzhi huiyi lu*. Volume 2. Hong Kong: Tiandi. 2016 彭述之回憶錄。卷2，香港：天地圖書
- Qiang Chonghua, Yang Shujuan, Wang Shudi and Li Xuewen**. 1982. *Chen Duxiu beipu ziliao huibian*. Hunan: Renmin chubanshe. 強重華，楊淑娟，王樹棣，李學文 編。1982年，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湖南：人民出版社
- Saich, Tony**. 1996. Edited.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 M.E. Sharpe. 中共力量的興起：文獻和分析。紐約：M.E. Sharpe。
- Schram, Stuart R**. 1999. Edit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ume V. New York: M.E. Sharpe. 毛澤東的權力之路：革命文集 1912-1949。卷5。紐約：M.E. Sharpe。
- Sheng, Michael M**. 1997.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打擊西方帝國主義：毛澤東，斯大林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 Sheng Yueh**. 1971.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個人記敘。羅倫斯：堪薩斯大學出版社
- Shi Fan**. 1932. "Zao yaoyan gaibianbuliao chichi ah!" *Huo Hua*. Volume 1 Number 10. 石凡 1932，'造謠言改變不了事實啊！' 火化，第一卷第10期。
- Sin-Lin**. 2012. *Shattered Families, Broken Dreams*.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Steven I. Levine. Portland: Merwin Asia. 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夢想。由Steven I. Levine譯自俄文。波特蘭：Merwin Asia
- Socialist Appeal**. 1938. 'GPU Tries to Frame Chinese Bolsheviks'. Volume 2 Number 10. 5 March. 社會主義訴求，1938。"格別烏嘗試框住中國布爾什維克"。第2卷第10期。3月5日。
- _____. 1938. 'Slanders Against Chen Tuhsiu Repudiated by Noted Chinese Scholars'. Volume 2 Number 22. 28 May. 1938年。"對陳獨秀的誣衊 遭中國知名學者否認"。第

- 2卷第22期，5月28日
- _____. 1938. 'Chinese Trotskyists Lead Strike Against Japan Ship'. Volume 2 Number 36. 3 September. 1938年。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打擊日本船隻"。 第2卷第36期，9月3日。
- Stranahan, Patricia.** 1998.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地下活動：1927-1937年上海共產黨和生存政治。 紐約：Rowman和Littlefield出版社。
- Tuolouciji [Trotsky].** 1947. *Zhongguo geming wenti*.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Xiao Kechuan [Wang Fanxi]. Shanghai: Chunyan chubanshe. 托洛茨基。1947。中國革命問題。由王凡西編譯。上海：春燕出版社。
- Wakeman, Frederic, Jr.** 1995.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年，警務上海，1927-1937年。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
- Wang F. [Wang Fanxi].** 1974. 'Memoirs of a Chinese Trotskyist'. *International*. Volume 2 Number 3. 王凡西。1974年。 "一個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回憶錄"。國際。第2卷第3期。
- Wang Fanxi.** 1991. *Memoirs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regor Ben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王凡西。1991年。 "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憶錄"。由Gregor Benton 翻譯並作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 Wang Jianmin.** 1973. 'Chen Duxiu via yu Zhang Shizhao chu ting'. *Zhonghua yuebao*. Part one July. Part two August. 王建民，1973。 '陳獨秀與章士釗出庭'。中華月報。第一部，7月，第二部，8月。
- Wang M.Y. [Wang Fanxi].** 1948a. 'China's Trotskyism in the War: Was China's War Progressive?' *The New International*. Volume 14 Number 2. 王凡西，1948a。 "戰爭中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嗎？" 新國際。第14卷第2期。
- _____. 'Problems of Chinese Trotskyism: Conclusion of the Minority's Document' *New International* Volume 14 Number 3. "中國托派主義問題：少數派文獻的結論" 新國際，第14卷第3期。
- Wuchanzhe.** 1930. 'Xiehui weiyuanhui zhuan 'Women de hua', 'Shiyue she', 'Zhandou she' quanti tongzhi'. Number 6. 無產者，1930。 "協會委員會撰 '我們的話'，'十月社' '戰鬥社' 全體同志"。第6期。
- Zhang Kai.** 1994. 'Remove all false allegations on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Shiyue pinglun*. Volume 24 Number 4. 張開，1994。 "消除所有對中國托派人士的虛假指控"。十月評論，第24卷第4期。
- _____. 2005. 'Zhongguo Tuopai zai kangzhan zhongde zhuzhang he xingdong' *Shiyue pinglun*. Volume 32 Numbers 2/3. 2005年， "中國托派在抗戰中的主張和行動"，十月評論，第32卷第2/3期。
- _____. 2015. *Joseph T. Miller Interview*. Hong Kong. 10 November. 2015年，約瑟夫·米勒採訪。香港。11月10日。
- Zheng Chaolin.** 1980. 'Chen Duxiu and the Trotskyists'. in Benton. 1996. 鄭超麟，1980。 "陳獨秀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本頓，1996年。
- _____. 1997. *An Oppositionist for Life: Memoi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Zheng Chaoli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regor Benton.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畢生反對派：中國革命家鄭超麟回憶。由Gregor Benton編譯。新澤西：人文出版社。
- Zheng Xuejia.** 1976. *Suowei 'Tuofei Hanjian' shijian*. Taipei: Guoji gongdang wenti yanjiu. 鄭學稼，1976。所謂 "托匪漢奸" 事件。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
- _____. 1989. *Chen Duxiu zhuan*. Volume 2. Taipei: Shibao wenhua. 1989年，陳獨秀傳，卷2，臺北：時報文化。

緬懷乃光

蕭舟

劉乃光同志，2018年9月4日逝世，他的離去，是我們中國托派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劉乃光同志使用過的姓名，有張開、陳卓、陳福祥等，我仍用在我們同志間最親密的直呼“劉乃光”或“乃光”。

我在1947年1月到了上海，不久進入“哲學班”，結識劉乃光，算來已經有七十多年的情誼了。哲學班借用育才中學的階梯教室，它比普通教室較大，能容納近百人。聽眾帶一本英文書，對外稱英語補習班。遇到可疑人員來查，彭述之的女兒陳曉霞(現名程映湘)即起立讀英文。哲學班學員專注聽彭述之講哲學、社會發展史、革命鬥爭策略等。

哲學班彭述之講學，但班務具體工作，都是劉乃光負責的。當年華貝、阿丁、康溪都是聽眾。



當年彭述之托派多數派出版二本公開刊物，一本是大型理論學術物《求真》，彭述之主編，發表彭述之、劉家良和國內著名學者的理論文章，另一本是普及宣傳刊物《青年與婦女》(簡稱《青婦》)，後改名《新聲》，陳碧蘭主編，劉乃光參加《青婦》編務，負責具體的出版事務。每期《青婦》都有劉乃光寫的時事評論短文。劉

乃光的文筆頗受讀者喜愛。

哲學班曾組織一次江灣葉家花園聯歡活動，一次虹口海寧路大公小學紀念托洛斯基被害紀念大會。這些活動，劉乃光都是默默無聞地做具體組織工作。

1948年開始，彭述之、陳碧蘭、劉家良南下香港，劉乃光夫婦也到香港，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彭述之、陳碧蘭、劉家良受港英當局迫害到了越南，劉家良被越共謀殺，彭述之流浪法國、美國。香港的革命工作由劉乃光等人支撐，《十月評論》是此時的中心。

劉乃光等到香港，我和他們就斷絕了聯繫。1952年12月中共大肅托，我經過失去自由與世隔絕三十五年後，1987年離開內蒙古勞改農場回到上海，逐漸見到一些老朋友，與鄭超麟、周仁生建立了密切關係，和劉乃光取得聯繫，此後三十年來，遺憾未能面晤，但書信電話不斷，情誼長存。

劉乃光在香港的數十年的貢獻，我無法敘述，僅以成果見到：(1)堅持以《十月評論》為核心的活動；(2)出資出版由天地出版社公開出了《陳碧蘭我的回憶》和《彭述之的回憶錄》；(3)組織人翻譯美國出的十二卷本《托洛斯基文集》和二卷《補遺》。《補遺》二卷已由周仁生和虞爭鳴譯成，十二卷本請施用勤翻譯，劉乃光每譯完一卷就支給稿費，現已完成近半了。待完成後爭取出版。

乃光的一生是光輝的、堅貞不屈的，緬懷他以寄托思念。

2019.1.12

Oppose Tyranny and Deepen Mass Mobilization in Hong Kong

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Since June 2019, Hong Kong has seen demonstrations of “No China Extradition Bill”, fighting for democratic justice, opposing violence of government, police, and triad. It has caught global attention. We fully support the movement of Hong Kong people’s fighting for democratic justice. We oppose the repressive political regime, and we need to deepen mass mobilization, and to link democratic justice to the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order to build a society with equality, justice, bottom-up democracy, and self-governance.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that “it takes more than one cold day for a river to freeze three feet deep.”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ve always suppressed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ince 2003, both governments have planned to pass the No.23 Article of national security by any means; in 2004,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vetoed both the universal suffrages for electing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in 2007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08; in 2007, the proposal of the two universal suffrage elections in 2012 was rejected; in 2012, the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of Moral, Civic and National Education was to be enforced; in 2014, the Resolution of Chin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31 August vetoed again the dual universal suffrages, which led to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and then the Umbrella Movement which urged to “Let the People Get Self-rule and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6, some protestors in Mongkok clashes were charged for rioting. One of them was sent to prison for 7 years. It was the longest prison sentence for rioting since the cessation of Hong Kong to the west. In the same year, six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from pan-democracy group were disqualified. From 2015 to 2018, the student leaders of Umbrella Movement, i.e., Joshua Wong, Alex Chow, and Nathan Law were charged with unlawful assembly and inciting other people to join an unlawful assembly, and they repeatedly appealed; in 2019, the planners of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i.e., Benny Tai, Chan Kin Man, and Chu Yiu Ming, and six other organizers were charged and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eight to sixteen months. The social wound is getting deeper. Years of repressed anger will not be held down any more. The future has become uncertain.

Hong Kong people continuously went for street demonstrations to make political appeals. Unfortunatel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been totally indifferent and refused to follow popular will. It made the people boil with rage. Protests have erupted unstoppably everywhere. On 9 June, the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held the demonstration of “Defending Hong Kong and Opposing China Extradition Bill”, and claimed that there were one million protestors plus one (the victim’s death due to protesting the bill). Ye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tentionally refused to listen to people’s voices, and declared to resum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on 12 June and even to advance the third reading. On 12 June, there was a general strike, and many protestors blocked the building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At last, the police suppressed the demonstration. On 15 June, although the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declared to “suspend” the Bill, but she refused to “withdraw” the Bill. On 16 June, the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held a demonstration to urg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fulfil five demands: (1) A complete withdrawal of the extradition bill; (2) not charging protesters and the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l arrested protesters; (3)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inquiry about abuses of violence by the police; (4) Retraction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otest on 12 June 2019 as “riots”; (5)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organizer claimed there were 2 million protester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as not moved by two demonstrations with millions of protestors, and still refused to withdraw the Bill. On 1 July,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stablishment Day, many people gathered in Admiralty and Wan Chai and demanded the release of the arrested protestors. At 9 pm, some protestors marched into the building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occupied there for about 3 hours. They cried out “there are no rioters, there is only *tyranny*”. Afterwards, they retreated and brought away the last four protestors who were unwilling to leave. On 21 July, in Yuen Long MTR Station and its vicinity, more than a hundred men, dressed in white, indiscriminately attacked unarmed passengers and passers-by. During the violent attacks, which lasted

intermittently for nearly two hours, there was zero police presence. The attack completely created a big shock and inflicted a lasting anger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fterwards, the police arrested 12 suspects but only on the charge of illegal assembly. On 27 July, the application for 'Free Yuen Long' Demonstration was rejected by the police, but thousands of people went to Yuen Long to denounce the government, police, triad, as well as rural groups of complicity in crimes against the people. On 28 July,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continued. Large-scale clashes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protestors erupted. The police issued a lot of tear gas, rubber bullets, sponge bullets, and pepper bullets to dispel protestors. At last, the police arrested 49 suspects and among whom 44 were charged with rioting.

The majority of protestors in these demonstrations were young people. The government neglected public opinion, and worse still, it turned deaf and blind to those young people who were adamant for democratic justice. This led to thousands of young people going for street demonstrations to fight for justice, to fight against the police's abuses of violence, and even the institutional violence exercised by law and police. Protests and resistances have happened in many communities. People are building Lennon Walls at every corner to voice out their ideas and discuss about political change. The ongoing movements are diversified. They adopt horizontal and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positing slogans such as "No Host" (to be self-initiated and self-organized), "Not to sever relations to your friends with different positions" (to show solidarity and tolerance), "be water" (to act like water carrying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nderness and toughness), making a wave of protests forcing the government under pressure, interrupting the operation of parliamentary system, and targeting the impotent bureaucracy, the abusive police, the brutal triads, and the local rural bullies. In the process of mass movements, in the intertwining of tears and blood, there is nurtured a good faith of "gathering people's power to change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 some people requested Europe and the US to intervene. They waved these flags and even asked for the consulates to help. It showed that they were completely disappoint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o they desperately turned to Europe and the US, even though they knew that they would not rescue Hong Kong. Ironically, such behaviors showed that they inherited the colonialist mentality. They still had illusions that Europe and the US have liberty,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and are superior than the so-called backward countries. Thus, they begged the former colonizers for help. However, if we look a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e can find that Europe and the US, with their hegemonic financial capitalism which enables them to support political puppets and economic dependents, have their utmost purpose to maintain the financial hegemony of Europe and the U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world.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large-scale democratic movement of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develop its own strength and reject any infiltration or appropriation by European and US hegemony. Meanwhile, we should be vigilan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inciting nationalism in order to shift public attention from covering its crimes of being complicit in the oppression by the Hong Kong bureaucracy 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in the super exploitation by big capitalists on the grassroots people.

This democratic movement directly appeals for political democracy, but what the authoritative regime wants to maintain is Hong Kong's inherited colonial economic system which over-exploits people and benefits largely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s, particularly property-developers and financial groups. Therefore, an appeal for a democratic system with universal suffrage should be linked to a program of economic democratization which fights for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secures people's livelihoods. That means a political appeal of universal suffrage, or a proposal of implementing political democracy, should be linked to social movements devoted to change Hong Kong's capitalism with its nature of injustice and over-exploitation. Any social resistance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will succeed only if it is linked to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against differentiation and xenophobia. Hence,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s must be linked to grassroots and social movements of mainland China a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resist together political tyranny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onopoly capitalism, starting from bottom-up battles for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31 July 2019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2019年7月31日出版

- 香港 2 反抗暴政 深化群眾動員……………本刊評論員
4 香港政治大事記 (2003年7月1日-2019年7月31日)……………燎原
11 劍指地產富豪以濟貧民……………高峽
- 中國 13 中國官僚買辦恭迎國際金融豺狼……………破謎
- 國際 15 社會主義革命和拉丁美洲統一……………茲比格涅夫·馬欣·考瓦勒斯基
22 反抗的提綱……………丹尼爾·本薩德
- 歷史 35 從團結到分裂——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約瑟夫·T·米勒
- 回憶 53 緬懷乃光……………蕭舟
- 英譯 54 Oppose Tyranny and Deepen Mass Mobilization in Hong Kong……………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OCTOBER REVIEW VOL. 46 ISSUE 1 2019.7.31

Hong Kong

- 2 Oppose Tyranny and Deepen Mass Mobilization in Hong Kong……………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4 Timeline of Political Struggles in Hong Kong (1 July 2003-31 July 2019)……………Liao Yuan
11 Targeting Property Tycoons to Redistribute Wealth for the Poor……………Gao Xia

China

- 13 Chinese Bureaucratic Compradors Warmly Welcome the Wolf of Financial Capitalism……………Pomi International
15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Latin American Unity……………Zbigniew Marcin Kowalewski
22 Theses of Resistance……………Daniel Bensaïd

History

- 35 From Solidarity to Split: Chinese Trotskyism and WW II……………Joseph T. Miller

Memory

- 53 Commemorating Naiguang……………Xiao Zhou

Article in English

- 54 Oppose Tyranny and Deepen Mass Mobilization in Hong Kong……………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